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at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Reform in the Shadow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现状和未来: 对比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聚焦政经改革中心的古巴共产党

白柯[[1]](#footnote-1) Larry Catá Backer

在劳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内部机构改革以及期望通过这些变革对国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忽略了对古巴共产党的研习，我们将无法全面把握这些动态。尤其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本文的主旨就在于任何有关古巴改革的讨论中，先锋党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西方学者籍以社会转型理论，以为当古巴社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时，有关意识形态的争执将会自然消融在空气之中。本文认为，相反的立场反而提供了更合理的分析基础，有关转型的争论自然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古巴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我们理解古巴国家政策的走向以及成功与否的关键。古巴共产党目前趋于成熟的意识形态体系不仅帮助塑造、牵引了国家机构以及党的运行，还同时塑造并牵制了所有关乎古巴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努力。古巴目前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现状存在的冲突和其衍生的紧张局势并不意味着古巴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做出唯一选择。在开篇概述后，本文第二部分将讨论为何意识形态是古巴问题的核心。在第三部分将审视古巴先锋党在党组织以及行使权力过程中探索的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种种决定及其后果。第四部分将考查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路径与国家机构的运行。特别关注自劳尔卡斯特罗执政后改革的走向以及短板。第五部分将讨论中国的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领域改革的经历。第六部分将展开讨论在中国改革模式下古巴意识形态改革的前景。最后，在第七部分，本文将估量古巴目前变革的成效，并指出古巴不需要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党国体制。全文每一部分将呼应本文的主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关键（没有全盘化的单一共产主义），可持续的经济改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国家体制下是可行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僵化，无论是古巴还是美国都会将国家指向危机和瘫痪。 在如此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发问：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否为古巴提供了一个框架？古巴改革是否太迟？如果改革，该采取怎样的目标和策略？

I概述

2014年春季，经过立法机关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批准，古巴共和国正式颁布新的《外国投资法》（第118号法），[[2]](#footnote-2)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新的监管措施。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举措都暗示了古巴当局对于新投资政策的重视以及期望这些政策能顺利生效的愿景。[[3]](#footnote-3)这部投资法在很多方面仍延续了了旧法Ley 77/95的操作[[4]](#footnote-4)。118法案为投资者提供了保证使其可以享受投资收益并免于无偿征收。[[5]](#footnote-5)但是这部法律同时也禁止投资活动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6]](#footnote-6)此外该法案还提供了投资收益的回流[[7]](#footnote-7)，以及特殊税收优惠政策[[8]](#footnote-8)。这部法律依然保留了多重国家机关审查批准合资企业和海外投资的任意裁量权[[9]](#footnote-9)。除了教育，医疗，以及军工产业外，其他产业对外资开放[[10]](#footnote-10)。投资既可以采用与古巴国营企业设立合资，合营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外资独资企业的方式。[[11]](#footnote-11)这也是首次古巴允许外资投资私营产业。[[12]](#footnote-12)海外投资法背后反映了古巴强烈的国家控制主导的产业逻辑，这一意识形态常见于1970s-1980s年代的发展中国家[[13]](#footnote-13)。例如，设立一系列的多层级外资审批机制。这其中包括了古巴国务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以及国家中央行政机构首长依据投资产业划分的审核[[14]](#footnote-14)。海外投资方和古巴投资方必须一道履行审核手续[[15]](#footnote-15)。除了个别例外，古巴当局依旧作为劳务经纪人，决定雇佣以及劳务的标准[[16]](#footnote-16)。外资只有在本土市场没有供应的条件下可以从国外进口生产所需的物资和服务[[17]](#footnote-17)。享受税收优惠[[18]](#footnote-18)的适用条件受制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以及财政物价部的行政决定权[[19]](#footnote-19)。同时，财政物价部将主管外资运行的审计报告义务[[20]](#footnote-20)。投资审批还取决于科技环保部[[21]](#footnote-21)对投资项目的科技转移以及环境影响的评估。[[22]](#footnote-22)纠纷解决一般适用古巴国家法庭[[23]](#footnote-23)，除特定条件下可以提交给仲裁机构。[[24]](#footnote-24)

出于对拉美社会主义地区联盟瓦解的恐惧，（即通过与委内瑞拉的石油合作项目以及拉美区域的政治团结从而实现拉美地区国有经济的一体化），古巴当局有意回归以往的吸引外资政策。[[25]](#footnote-25)古巴境内[[26]](#footnote-26)流传出的网上消息就曾指出这一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对于古巴的新庇护者巴西是显而易见的[[27]](#footnote-27)。从另一层面看，古巴当局的顾虑还表明了一种执政思路：即使古巴经济越发凋敝，政府宁愿向外资企业出卖本国劳动力，牺牲国家收入独立性，也不愿意本国公民开放私有经济部门。[[28]](#footnote-28)对于118号投资法的出台，新闻报道中充满了言辞谨慎的客套[[29]](#footnote-29)，也有部分评论对于如何实施新的投资政策仍持有疑问。[[30]](#footnote-30)比如 “古巴政府能否建立一个吸引外资的投资环境，并拥有一套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行政审批程序，真正透明且能在短时间内对投资计划进行审批[[31]](#footnote-31)。”

如果回望历史，我们恐怕难以对古巴心存乐观。在投资审查的层层关卡中，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将118号法案的法治精神消耗殆尽。面对种类繁杂的国家政策法规以及古巴共产党与国家机关间暧昧不清的关系[[32]](#footnote-32)，118号法案的顺利实施以及其他针对国有经济部门，国家部委之间的监管措施恐将难以实现。其次，因为私有经济部门被排斥在海外投资的项目之外，降低人民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依赖的努力也被严重削弱。此外，陈旧的中央计划模式将有可能以监管外资运行的面目重新出现。

上述的那些问题都可以很轻巧的归罪于古巴腐败无能的政府，贪恋权力的权贵精英[[33]](#footnote-33)， 法治系统的失败。（即通过国家机构划分个人势力范围，形成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对个人的效忠高于对国家体制的效忠[[34]](#footnote-34)）部分指出这是体制缺陷。[[35]](#footnote-35)一些口气缓和的评论者宣称只有针对国家行政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可能才会产生实效。[[36]](#footnote-36)显然这是在责怪问题出在行政机关身上。更为尖刻的评论者可能会指出这一切都归咎于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118号法案以及其他类似的企图诱导海外投资的政策都是古巴社会主义体制失败的佐证。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拥抱当今盛行的各类自由市场制度的变体才能得以纠正。[[37]](#footnote-37)

这些言论既有缺陷也有可取之处。118号法案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的确是体制失败的佐证。这一失败正是表明了古巴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存在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无法为现实治理的需要提供任何积极的指导。这一失败是古巴自食其果。但是另一方面，体制的失败毫不意味着需要通过抛弃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根基，拥抱西式民主国家制度来纠正；尽管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是支持古巴采取西式民主国家制度。118号法案中的种种弊端并非是马克思列宁理论本身或者古巴党国家体制模式（即执政党享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民主性方面造成的。转型成为某种西方民主私有市场的模式并不带来凯旋。[[38]](#footnote-38)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体制的执行者自身，即掌权者没能发展出一套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适应现实实践的需要。尤其是思维简单的投入到革命情怀之中，并倾向在这种革命情怀上建立一套指导理论，极强的守旧思维而缺乏发展的眼光。如此而产生一种思维惰性，无法跳出革命情怀，在半个世纪中形成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僵化，无法推动社会前进[[39]](#footnote-39)。正如本文下面将阐述所示，与美国社会类似，古巴社会的意识形态与宪政路径反映了一种保守主义价值观以及原教旨主义抬头[[40]](#footnote-40)。

忽略对古巴共产党的研习，我们将无法把握古巴国内政治经济风起云涌的局势。这一点对于比较性研究的学习极为关键。本文的主旨就在于指明任何讨论古巴改革的话题中，先锋党的意识形态问题举足轻重的。西方学者籍以社会转型理论，认为当古巴社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民主体制时，有关意识形态的争执将会自然消融在空气之中。[[41]](#footnote-41) 本文的立场正为相反，认为意识形态对于理解古巴的局势及其面临的选择极为关键。国家体制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判断古巴的各项产业政策能否成功的核心。借助古巴共产党既有的意识形态，建立并运行党和国家机关的途径，发展并变革经济，社会，政治模式的尝试都逐步形成并受其指导。[[42]](#footnote-42)

即使古巴目前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状存在冲突而出现了紧张局势[[43]](#footnote-43)，这也不意味着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做出唯一选择。[[44]](#footnote-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便为古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即通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路径，适应本国国情，稳定本国政治权力。[[45]](#footnote-45)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现代化革新是一条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改革完全不同的道路。[[46]](#footnote-46)中国在社会经济组织方面采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较为不同。[[47]](#footnote-47)本文认为，古巴共产党不需要复制中国模式，但是古巴共产党应当认真考虑中国是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并借此建立一套有条理的，且与本国自身改革相称的体制。显然，这意味者古巴需要来一场理论创新，改变其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陈旧思想观念。

在结束绪论后，本文的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古巴和中国党国体制以及构建改革发展分析框架中的重要角色。本文由此提出六个有改观意识形态的论点：意识形态在构建古巴党和国家的作用，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以及在中国改革模式下进行党和国家改革的可行性。这其中的分析将着重关注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党组织，以及党与国家机构关系从而导致两国产生不同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部分将关注古巴问题的核心，即古巴的意识形态。首先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一般的概述，然后关注古巴意识形态的特质。在第三部分将审视古巴共产党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是如何塑造古巴的体制及权利运作。第四部分将思考意识形态体系如何直接影响到古巴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特别关注自劳尔卡斯特罗执政后改革权力的可行性以及制约性。第五部分将关注中国模式为古巴提供参考进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改革。本文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西方民主市场经济本质一样，都可以由不同的变体存在。第六部分将讨论古巴路径的前景。第七部分考虑古巴当下变革的成效并指出古巴不需要抛弃马克列宁主义与党国政体。

全文每一部分将呼应本文的主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关键（没有全盘化的单一共产主义），可持续的经济改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国家体制下是可行的，意识形态体制的僵化，无论是古巴还是美国都会将国家指向危机和瘫痪。 在如此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发问：中国的改革进程是否为古巴提供了一个框架？古巴改革是否太迟？如果改革，该采取怎样的目标和策略？这些问题都将指向唯一的可能性：古巴将进行转型。但是不是朝向西方市场经济民主体制，而是较为容易过渡为一个更有活力的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尽管任何转型都存在难度，但是后者的破坏性更小。

II 意识形态作为内核以及古巴马克思主义进程

道格拉斯·诺斯在他有关机构组织以及机构组织变革的著作中提醒了我们：“观点和意识形态很重要，而机构组织是决定意识形态重要程度的关键元素。观点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了主体的精神世界使得个体可以解读其周遭环境并作出选择。”[[48]](#footnote-48)无论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还是高呼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意识形态是古巴改革问题的核心。 但是这里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视野下“意识形态”这一标签并不是一回事。相反，这里的意识形态更适合理解为一种对于一国基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义的表达[[49]](#footnote-49)，正如同将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精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50]](#footnote-50)这些观念也许不是识别，组织，行使权力的正式工具，但是对于权力的表达，组织，行使起到了疏通与牵制的功能。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至少在适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意识形态是作为该主义核心观念的一种表达。此处的马克思主义，以其核心元素，代表的是在社会，道德，经济以及政治组织下关乎人类尊严的自然权利。自19世纪晚期，这种观点及其设定的立场一致备受争议。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关人类尊严泉源的学说一直广受争议。目前存在多种理论观点对这一议题进行解读并由此共同构成了一类核心的意识形态论。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的以构建，并受之影响支配。比如自然法，公民国家的普通法宪治传统，宗教以及风俗习惯。对于现代民主社会而言，这一意识形态更附有了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且建立在宪政主义之上，并对国际人权体系的形成施加影响[[51]](#footnote-51)。所以，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体制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自然而然的[[52]](#footnote-52)。

意识形态同样居于列宁主义的核心，以作为对先锋党约束从而保持其先进性。意识形态是先锋党获取统治合法性的核心元素，并同时勾画出政治图景要求先锋党必须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列宁主义持有这么一种立场，认为理论的发展是不可不分离。这一点在革命上升期时尤为真实。列宁主义的这一立场可能是对一种传统的西方观点的传承与发展，即组织纪律在总体上反映了组织的价值观。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民主的发展同样流淌着革命的血液，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53]](#footnote-53)以及代议民主制下各个州所组成的民主联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立宣言这一表述西方民主核心意识形态的典范中蕴含了与列宁主义相同的元素。（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并通过政府机构来确定。当政府违反了这些权利的原则，人民有权去推翻）换言之，列宁主义所坚持的这样一种状态，即组织政府的根本前提在于一切政府的合法性都依赖于政府机关能否遵守并推动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正式对社会政体及其个体成员的真实反映[[54]](#footnote-54)。

B． 在古巴党国家马克思主义下意识形态的特质

The Character of Ideology Within Cuban Party-State Marxism.

Ideology is basic to political discourse in Cuba, as it has been on other Marxist-Leninist States.56 Liss nicely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正如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那样[[55]](#footnote-55)，意识形态是古巴政治话题的核心[[56]](#footnote-56)。曾有学者很好的描绘了意识形态与国家组织的关系：“卡斯特罗 和 切·格瓦拉以为在没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以为通过改造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古巴和卡斯特罗偏离了经典的列宁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而坚持意志决定物质。[[57]](#footnote-57)”于是卡斯特罗自己陷入意识形态的战场[[58]](#footnote-58)，并使得古巴陷入了国家间和国际间意识形态阵营[[59]](#footnote-59)。

可是古巴当下的意识形态与美国社会相似，都存在原教旨主义的问题。[[60]](#footnote-60)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视野，（对政策和机制的理解和处理依照某种意愿做出解读），从满了浓厚的守旧元素。[[61]](#footnote-61) 具体说来，原教旨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特殊的，自我设立的解读视野，其根基是在没有其他的国家行动时，组织规则必须严格的再现规则成立的初始状态。 当然这种原教旨主义丰富了美国学术界司法界的学术以及司法实践讨论。[[62]](#footnote-62) 不过这里还有其他的意义并经常被人忽视，即理论在成熟的一刻将转化为创立法律和宪政权威的行动。这样一来法官对于意识形态的文本表达做出新的解读被视为对人民主权，立法权的篡取，显得可疑与虚伪。在德国[[63]](#footnote-63)较为盛行的动态宪政主义（living constitutionalism）[[64]](#footnote-64)以及全球化宪政主义（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65]](#footnote-65)在美国竟受到来自最高司法体系内的嘲弄。[[66]](#footnote-66)由此一来，原教旨主义在美国本土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任何试图革新意识形态的意图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当然其结果是视思想僵化[[67]](#footnote-67)为积极与稳妥。[[68]](#footnote-68)古巴共产党似乎与大法官斯卡利亚在原教旨价值观阵营有不少共同语言。This form of preservationist orginalism ought to contrasted to an originalism that seeks to build on key principles of the founding generation and of the original texts on which a political system has been built.  This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originalism seeks to build on the original principles by retaining a fidelity to original principles while applying them scientifically and with sensitivity to current context. This sort of originalism is built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Germany and is practiced in China.

*Maybe you can even go further relate this with Mao zedong’s famous 反对本本主义 Oppose book worship: “whatever is written in a book is right” you can read this part here:*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6/mswv6\_11.htm*](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6/mswv6_11.htm)

*III. Oppose book worship*

这种原教旨主义（教条的本本主义）必须和遵循革命一辈奋斗创建的革命精髓，原则，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些而建立的政治体制做严格区分。后者是一种对政治原则，价值观的遵从，其来源于文本，但科学地适用于具体实践之中。这一现象在德国宪法以及中国实践中都有表现。

古巴的原教旨主义将意识形态定格到了1959年的革命凯旋时刻。古巴通过其先锋党，古巴共产党，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以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应用到党组织的构建及权力行使之中。古巴共产党选择了东欧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径。尽管这一路径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其宣扬的“真理”与现实相脱节。斯大林主义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造了了思想僵化，试图将思想永远定格到革命凯旋的那一时刻。将革命不朽化成为意识形态的终极立场。[[69]](#footnote-69)意识形态发展的动力不过是继续维持这种革命情怀。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古巴构建的意识形态不仅在组织内部应用中体现了这种保守倾向，同时在构筑区域贸易平台，施展古巴国际影响力[[70]](#footnote-70)的战略中也展现了这种保守倾向。

III． 古巴意识形态路径，从革命到Lineamientos

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下的原教旨主义对古巴进行治理以及机构改革的前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正如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古巴共产党不参与理论建设及创新。[[71]](#footnote-71)这里似乎在暗示古巴不再重视理论工作，实际上另有它意。古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理论的重要性，不能单单由党的机构来处理理论。这样一来，其偏向的政策是保守的而非发展的（现实的实践与官方的理论相脱节）下面将详细讨论。

首先，古巴原教旨主义认为出于理论的重要性，理论属于重要的革命果实，古巴共产党不应插手过问。由此一来，古巴共产党有意将自身置于意识形态体制之中，化身为政治运行的附庸，使体制成为理论实施的工具。 这种实践创造了一个，不断弱化古巴共产党及其政治理论的环境。古巴共产党缺乏组织能力来开展理论工作。通常党的领导人而非党组织在进行理论工作 [[72]](#footnote-72)。仅仅观察古巴共产党党代会自从1970年代起不规则的召开时间，我们不难发现古巴共产党参与理论工作的程度以及这一实践对于政府运行的宪制表述所产生的影响。第一届党代会（1975年12月17-22日）确立的党的理论基础：基于苏联共产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以及古巴的革命情怀。[[73]](#footnote-7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届古巴党代会确立了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拒绝静态的机械的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74]](#footnote-74)但是对意识形态的学习立马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论述相纠葛从而在党的组织和领导层面冲淡了意识形态。所以，在第二届党代会（1980年12月17-22号）上，大会强调了需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75]](#footnote-75)并增加了国家主义以及革命斗争的内容。[[76]](#footnote-76)第三届党代会（1986年2月4-7号）关注了中央计划并重申了以国家主义和国际斗争对抗资本主义为内容的意识形态。[[77]](#footnote-77)第四届党代会（1991年10月10-14号）关注的是守卫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 那段时期出现了勉强的革新:向天主教信徒以及其他有宗教信仰的群众开放入党的机会。[[78]](#footnote-78)第五届党代会（1997年10月8-10号）继续关注了通过建设中央计划经济坚持革命主义意识形态。[[79]](#footnote-79)直到第六届党代会（2011年四月16-19号）古巴共产党开始进行更为热烈的有关意识形态体制的讨论，尽管领导者们较为沉默。[[80]](#footnote-80)将这些现象综合起来，古巴的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古巴共产党是一个守旧维持现状的执行人，维持那些从诞生之起未曾变化的意识形态。

第二，古巴的意识形态不断在灌输一种观点即意识形态是静态不变的。在这一点上，古巴带有革命情怀的原教旨主义与那些坚信政府组织维持至宪法诞生情形初始状态的美国宪法情怀原教旨主义不谋而合。[[81]](#footnote-81) 对于古巴国家体制该如何组织和运行的各种理论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定型而不需要改变。古巴共产党的事业表明其并没有发展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共产党仅仅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教条的形式上的放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部分观点。（阶级斗争，国际革命主义以及对市场的怀疑，坚守中央计划）。

理论与历史的交织是构建古巴意识形态根基的一大核心特色。首先谈论历史：（无论下面这种历史观是否客观）古巴革命是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在城市，在糖业工业中心，以及乡村中的工人们构成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工人们积极的武装支援对于革命政府巩固，维护政权是至关重要的。[[82]](#footnote-82)”其次谈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构建并发展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表述的基石。

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表述的基础，其理论依据取决于一个外部因素：诞生于古巴对抗殖民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这里首要的证据便是何塞·马蒂的著作。何塞马蒂是古巴所有意识形态阵营灵魂的源泉。[[83]](#footnote-83)马蒂的著作仍然是古巴政治理论的根基，[[84]](#footnote-84)并构建了古巴的爱国情怀以及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85]](#footnote-85)马蒂的经历同样见证了古巴与美国间复杂的邻国关系。历史上美国既曾作为古巴的庇护所与理想之地，[[86]](#footnote-86)也曾作为危险的邻国。[[87]](#footnote-87)其次的证据便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主义。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马蒂的国家主义按照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国家视野被重塑[[88]](#footnote-88)为新的理念：对私营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区域国家计划经济，[[89]](#footnote-89)社会主义阵线的国际友谊，[[90]](#footnote-90)以及视全球化，主权财富作为对抗弱小贫困国家的战争。[[91]](#footnote-91)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反殖民的国际主义向融合。

这些理论规范的基础被糅合至古巴的意识形态，并被视为革命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13年对此做了一个好的总结：“革命就是掌握勇气，智慧以及现实进行斗争；革命从来不会欺骗，不会违背道德准则；革命确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粉碎真理和真相。革命就是团建，就是独立，就是为古巴，为世界的争议而奋斗。着一些既是我们爱国情怀的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以及国际主义。”[[92]](#footnote-92)的确，在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元素之下既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美国共产主义学者德雷珀（Theodore Draper）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表述形容古巴的情形较为恰当：卡斯特罗使得共产主义在古巴获得政权，而共产主义使得卡斯特罗获得理论的武装[[93]](#footnote-93)。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最初源自于苏联的统治，尽管采取了许多相同的形式来表述共产主义，但是并不是革命的手段，只是为了更为贴切拉丁美洲的情况[[94]](#footnote-94)。

解构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古巴共产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拉丁美洲国家大团结的理念。作为古巴意识形态的教父，何塞.马蒂思想的基础就是独立自主。古巴共产党就将有关阶级斗争以及消灭阶级的革命精神写入党章条文之中。比如确保社会道德，推动集体主义，深化革命理念以及继续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他错误思潮相斗争，不断推进社会正义，平等朴素，国家荣誉，克服种族歧视，缺乏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反对腐败。[[95]](#footnote-95)

尽管古巴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坚持其传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但是在第6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古巴共产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经济社会政策纲要中首先确立的是重申古巴继续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96]](#footnote-96)改革意味着适度的、有计划的向私有经济部门开放市场，国有经济仍然掌握主导地位。[[97]](#footnote-97)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保持主导地位，其他经济体，例如海外投资，合作经营等得到法律的认可。[[98]](#footnote-98) 但是私有经济部门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不能采用公司制并且不得拥有资本。[[99]](#footnote-99)私有经济部门的活动[[100]](#footnote-100)受到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监督和调整控制。[[101]](#footnote-101)按照效率和经济利润的标准[[102]](#footnote-102)，企业间合营的模式将受到国家的监督管束[[103]](#footnote-103)。海外投资不可避免的被当成剥削者，只能作为内部投资策略的一种补充，[[104]](#footnote-104)或者被国家利用在特殊产业中[[105]](#footnote-105)去实现某种经济目标[[106]](#footnote-106)。所以，作为不可避免的剥削者海外投资在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后难免被抛弃[[107]](#footnote-107)。

显然《经济社会纲领》面临的困境在于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1989年动荡期之前，落后于改革的实际需要。所有针对古巴现状而做出的理论调整都是暂时的且应当符合苏联解体前古巴所持的立场。在新的社会政策下这种困境是显然易见的，从革命情节的推崇[[108]](#footnote-108)，到继续进行文化工作，[[109]](#footnote-109)或者在工业，能源政策中强调中央计划[[110]](#footnote-110)。这里并不是批评纲领没有对古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做出变革，而是深层次的改革并没有冲破对陈旧自相矛盾的思想的束缚。这里并非想得出结论说纲领无法对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深远的变革，只是纲领所表述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坚守陈旧理念，这与变革是相冲突的。

这种处理问题的路径很明显是列宁主义的倒退。比如在法规制定中偏向行政机关，赋予其巨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税收手段强取私营经济部门生产交易的“剩余价值”，通过许可证制度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并且重审了所有偏离国家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都是暂时的，并且可由国家随时取消。

IV. 从意识形态理论路径到国家实践；古巴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下的前景：产业许可，企业联合，以及118号法案

意识形态理论对于一国改革的广度和前景有着直接的重大影响。古巴当下的海外投资政策改革就明显的带有计划经济的控制色彩，比如所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都要经过一系列繁杂的审批获得许可。这将导致法律法规让位于官僚系统的官员个人权威，打开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的大门，削弱经济改革的成效。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理论的边界我们才可以了解改革的实质。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改革的悖论：试图开放市场但是仍然由计划经济掌控所有经济活动。这里的意识形态理论仍在死守中央计划经济而拒绝做出变革，本文在前面就曾提出。

自从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古巴一直不愿意放弃管治和反制的国策。[[111]](#footnote-111) 国家依旧延续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体制。[[112]](#footnote-112)这种体制的运行的核心就在于将外资，科技以及贸易的引进降至最低程度。由此而来，改革的重点在于外国投资而非本国投资。外资和本国劳动力市场之间被尽可能的分割开来，这种物理上的隔绝本质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尽量避免沾染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元素。[[113]](#footnote-113)

在很大程度上，当今的古巴政权依旧在施行这些政策。不过第六届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以及在大会上通过的经济纲领显露出了一些精心设计的改革内容。尽管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带有革新的色彩，但是国内的保守力量仍然反对任何变革的努力。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种模式的思维向国内推导，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新海外投资法为何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外资合营，正是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这种严格的法案，致使近200多个行业受到投资许可的限制。

当前有关私营经济主体的法体系运行和发展受到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限制。其基本观点为私营经济主体需要特殊的管理和认可。如果没有经过认可，则有国有经济主体来取代。每一个认可都需要经过行政申请程序，政府机关享有极大的自主权。由此，将增加权力寻租的风险。 优于古巴缺乏像样的反腐机制，腐败将不仅侵蚀到党本身还会伤害到私营经济的发展。陈旧的意识形态理论使得古巴无法去发展另外一套外资体制：即减少镇政府干预的，备案式的自我监督管理体制。除此之外，计划经济使得批发市场难以摆脱国家计划的控制，从而激发黑市的诞生。而更糟的是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并借机剥削他们。例如近期就有政策试图对克服生产瓶颈而进行的非官方进口行为进行征税，此政策将更加打击非公有制经济主体。[[114]](#footnote-114)所以，为了国家和大众的利益应当减少国家的过分干预。

经济纲领中以合作或类似经营模式进行的试点改革将更加暴露出以上提及的问题。[[115]](#footnote-115)经济纲领中允许的合作经营将在一个高度控制的环境下缓慢增长。他们创制了一套繁杂的法律体系但同时又在很多层面上给予国家机关诸多自由裁量权。[[116]](#footnote-116)合作经营不直接受到国家的控制，但还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国家官员仍然有权来决定进行何种形式的合营，包括关闭企业。[[117]](#footnote-117) 这些经济模式充满了风险，而投资人也急切期望受贿投资。理查德·芬博格就报道“在一个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下，这些古巴的企业家们通常期待在一到两年内受贿投资，考虑到低价劳工，租金，设备以及无利率的贷款，这一目标还算是现实。”[[118]](#footnote-118) 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保守倾向，短期投资计划都在加速实施，以避免试验性质的投资改革立马终结。这也再次表明意识形态对自由裁量的强大依赖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友好。基于环境所需（也许是暂时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被国家所打击，受到各种中央计划，税收的限制。[[119]](#footnote-119)这一切将最终传导至批发市场，许可证持有者的经营以及黑市交易市场。[[120]](#footnote-120)再次重申这也将导致腐败[[121]](#footnote-121)。

118号法案也不例外，无法免疫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除了在意识形态影响下，118号法案的外资投资政策可能无法与国际接轨外，其他有关合营限制，许可证制度都将继续在118号法案中出现。[[122]](#footnote-122)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18号法案没有另立门户而是对1990年代的投资政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修订和修改。[[123]](#footnote-123) 但是这里也流露出一种对“对外开放”更为强烈的信念。例如，对外宣布（尽管并没有法律效应，但是却显示了一种理论上的松动）海外投资是古巴整体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18法案承认外资可以享有企业的多数股份，简化许可批准的申请流程，提高效率。不过申请许可的程序，以及这些制度背后蕴含的计划经济理念仍然占据核心地位。最后，118号法案缓慢的开放了古巴的劳动力市场，这一较有潜力的转变仍然因为占据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蒙上一层阴影。当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124]](#footnote-124) 此外，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松动主要是因为新海外投资政策的出台，例如对外资利润税收的降低。[[125]](#footnote-125)

但是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实质性限制仍然存在。海外投资政策仍然属于国家及国有企业的领地。个人仍然不能通过合资方式参与进来。由此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针对特定投资项目而设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外国投资的组合。这一组合使了国家处于强势地位（比如ALBA），加深了其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差距。许多人已经开始对此感到不满，他们觉得这是差别对待。一方面个人参与生产力活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国家和外国合伙人不受限制。[[126]](#footnote-126) 放眼于中国，国家并没有向公众清楚地交代中国发展的路径的本质（在我看来，可能领导干部了解的更多）。[[127]](#footnote-127) 如果劳尔·卡斯特罗能够以118号法案为契机，将古巴陈旧五十载的意识形态理论搁置一边，那么这将是一件极大的成就。

这一运动目前还没有要求在古巴原教旨主义允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卡斯特罗主义）的区域外设定新的新的底线。这里新的底线包括其它国家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发展的本土化理论创新。在这国家中，中国模板最具指导意义，影响意义。本文也希望详细对比讨论。

V．中国样本以及其他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途径

正如同西方民主和市场主导制度一样，通往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道路是多元的。除了欧洲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模式，以及托洛斯基理论外，还有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样本。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样本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上而朝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断发展的。这条道路上，列宁主义提供了组织原则的基础，尽管组织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社会主义现代化）。[[128]](#footnote-128) 通过和谐发展的理论指导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靠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最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发展的样本中，党为了传承革命的火种，坚守先锋党的职责，不断根据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发展党的指导理论。这一做法正是党章里所说的 （党的指导理论）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29]](#footnote-129)

文革结束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和东欧国家，拉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类似的。每个国家本质上都是列宁主义，其合法性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之上，并由之来决定其是否具有政治精英的品质成为党员。在这一套理论下，法律，政治和经济全部汇聚在一团， 国家与党的界限既混乱又实际，在实践中继续。但是从大跃进直至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人帮成为过去式后，中国迎来了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发生了变化。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道路。与其纠缠于于过去，邓小平选择了承认错误并展望未来。而古巴共产党也只是在近期才施行了这一做法。[[130]](#footnote-130)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后决定对其意识形态理论做出重大的调整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沿袭传统，采用了四项基本原则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以反映当下的现实需要。[[131]](#footnote-131) 邓小平同志否认了极左的文化大革命，”由四人帮推动的虚假的，极左的社会主义，造成了普遍的贫穷。“[[132]](#footnote-132)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则是一套科学的思想体系。[[133]](#footnote-133)这里真正的思想解放就在于继往开来的不断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34]](#footnote-134)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一套建立在马列主义之上的科学体系， 其本身能够突破思想的禁锢，并能够通过不断演化来反应中国的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精髓。在科学实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未来四十年中，思想理论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在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中不断淡化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断强调改革开放以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高生产力（扩大非公有制经济部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确立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的理论框架[[135]](#footnote-135)。在科学发展列宁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强调了党内民主和体制内民主与法治。强调组织而非个人主义，强调集体协作而非个人专断。三个代表的思想使得其他他非工人，农民的社会优秀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古巴社会仍然强调将阶级斗争作为基础，而列宁的组织原则也仅仅被改造为民族主义和国际卡斯特罗主义。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理论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在其传统原则的基础上都依照现代社会的需要进行了深层次的变革。目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明确的并代表集体智慧的理论为指导。 在社会转型中不断实践发展习近平的中国梦理论。正如其所说“振兴中国的中国梦。”[[136]](#footnote-136)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与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在表述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其对待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也完全不同。

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将古巴和中国进行对比并非要求古巴照搬中国的模式以解决经济，社会，政治上的难题。这并非本文的初衷。古巴应当自己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的路径，当前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素材以支持这样的本土化。古巴应当向中国学习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用发展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目标。《经济社会纲领》并没有符合这种精神与标准，其指导原则与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对陈旧政治原则做出的妥协是违背列宁主义精神的，抛弃了民主集中，保留了小团体主义。所以本文的立场是古巴共产党不是过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本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古巴需要制度与纪律，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做的。

也许与往不同的是，劳尔·卡斯特罗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促使古巴能够迈向未来，改变陈旧的东欧苏联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改革。[[137]](#footnote-137) 但是《经济社会纲领》流露出来的那种极左思潮与东欧苏联施行的社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如出一辙，阻碍了古巴设定的发展意图。总体而言，苏联援助体制意味着被援助国家的本国发展必须完全受制于苏联的总体规划。中国在与苏联交往的50年代-60年代就对这种极左思潮，大国沙文主义有所体会。古巴共产党内现在才勉强的意识到中国在1980年通过邓小平理论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只有古巴共产党直面这一切才能改变自己陈旧的意识形态观念，解放思想使得政治治理的框架能够反映古巴的现实需要。非实事求是本来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VI． 展望古巴意识形态的前景：在中国模式下的古巴改革路径

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塑造古巴共产党与国家有着直接的影响。组织文化与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的。而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国家和党，以及对外政策的根基。具体而言，在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下，党和国家机构的相互融合淡化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概念，削弱了法律治理国家的作用而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权威。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古巴共产党安于现状，难以进行体制建设，消除腐败。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古巴共产党成为保守革命情怀的卫道士，拒绝任何理论革新。古巴共产党知道近期才流露出改革的意愿，例如，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分型革命建设的经验。[[138]](#footnote-138)

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总纲[[139]](#footnote-139)。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40]](#footnote-140)。

我们可以注意到，古巴共产党之所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141]](#footnote-141)的概念来不断地科学发展的党的理论思想是因为古巴共产党仍然死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计划经济理论，并以此作为国家对内对外的施政纲领。即便古巴现在打算开放国门，如此陈旧的计划经济结构也将导致古巴难以适应世界各国惯行的经贸法则。此外，这种固守己见的保守思想也成为卡斯特罗主义用于指导党内事务，国际关系事务的核心理论[[142]](#footnote-142)。

古巴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反映的是一种仅关注于革命以及革命情怀的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主旨就是对旧秩序变革的革命情怀，一种将革命激情永恒化的追求。古巴共产党将这种革命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到下列这些情形：第一，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及其他劳动者的无比忠诚；第二，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剥削”主义毫不动摇地反对；第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动的运用到古巴具体的国情以及自身，或其他国家共产党实践经验之中；第四，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持以及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反对，与反动力量和帝国主义相斗争。支持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群众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运动；第五，与群众密切联系。

古巴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对于古巴的党政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和运行产生了直接而具体的影响。一个组织架构的文化传统与其指导思想应当是相协调的，对于古巴的党政国家机关以及古巴倡导的拉美地区团结主义，也不存在例外。在古巴，党政不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混为一谈。在这样的情形下，法律的地位被降至于社会管理层面，而执政者更是利用可以自由裁量的行政命令即政策来取代法律法规。在这样的风气下，古巴共产党根本没有执政行为制度化的积极性，例如通过制度来打击党政国家机关，国家干部的腐败行为。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这种指导思想使古巴共产党剑走偏锋，执拗于革命情怀，不肯回应古巴发展的现实需要。直到近期，古巴共产党才语焉不详地流露出其愿意与中国共同分享施政经验。[[143]](#footnote-143)

在党国家体制下，政兴与否依靠的是先锋党，即共产党是否以身作则。这当然也是马列主义中列宁思想的深刻洞见，即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国家发展理论，而列宁主义则指出了党的组织基础原则。[[144]](#footnote-144)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基础理论奠定了基础之后，并不意味着后人就不需要根据实践的具体情况而对基础理论进行发展和改善。的确，理论僵化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一直困扰着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145]](#footnote-145)

古巴的组织结构仍然保留了很强的列宁主义色彩。菲德尔·卡斯特罗多年以来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革命家。尽管在某些外界看来他天生无法容忍社会不公[[146]](#footnote-146)，实际上这不过是列宁主义口号中强调一个共产主义者应当具备的革命素质。[[147]](#footnote-14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战后一时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如此强调革命情怀的古巴共产主义党人从来没有在革命胜利后真正将革命情怀转变为革命性的建设与发展。古巴共产党和卡斯特罗继续坚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尽管这个依赖于阶级斗争理论，并源于欧洲革命运动的组织早已名存实亡。[[148]](#footnote-148)

虽然中古两国共产党同属列宁式的政党，但是两者之间的体制并不相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如何扮演先锋政党有着不同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推动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的确，中国的做法似乎远离了那些迂腐和教条的理论思想并开始发展自己的民主制度，中国特色的民主同样拥有潜力与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宪制潮流相接轨。在就任党的新一届总书记的发言上，习近平就提出党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转变陈腐的东欧共产主义思想，将共产党塑造成为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这种转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提升本国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以更好的满足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体制下通过政治和经济组织来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西方社会向对比，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民主观：即民主是通过执政体的内部机构的民主实践来实现的。西方则相反，民主是通过外部运作，即民选代表执掌执政体来实现民主。[[149]](#footnote-149)

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同时更用心来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实体价值。结合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正如他所讲，党需要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成功转型。[[150]](#footnote-150)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得到新的解读与发展[[151]](#footnote-151)：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改革的动力在于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稳定经济基础来发展党的建设。

古巴共产党则与中国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仍然死守革命情怀。这种革命保守情节超脱了历史和治理的范畴，蔓延至整个古巴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这种一根筋的保守是否与美国的长期制裁有所关联，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古巴共产党的这种保守僵化使其无法履行作为一个先锋党的执政职责: 重整自己，带领古巴人民发展古巴社会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脱离历史背景而言，一个政党的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同时胜利。在这一点上，两国共产党的认识就不同。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自己需要去奋斗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古巴共产党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在政党革命胜利时建立，只需要通过统治者来维持就可以。这种不同导致两国在对外交往，处理内部事务方面表现各有不同。在古巴的意识观念下，共产党只需要通过强权领导人的个人威信而不是强有力的制度纪律来维持党的执政[[152]](#footnote-152)。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党的党组织结构和政权文化的不同。

但是古巴共产党政权因为将个人权威置于组织之上而还带有斯大林主义色彩。[[153]](#footnote-153)组织机构本质上应当是实施集体意志的工具。但是在古巴，这里组织代表的只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将个人意志置于一些列组织规章下，集体地通过指导思想解决具体问题。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就是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思想与卡斯特罗本人本应当是相区分的。外部人士就曾谈到把党的执行力问题和将党通过党的干部的个人能力来实施权力的问题相混淆而产生的矛盾。在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问题时，丽丝（Shldon B. Liss），这位观察者就同情道：他错就错在把拉丁美洲的革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制造出菲德尔主义或者卡斯特罗主义，这些个人主义反映的是个人权威迷信，而不是对共产党组织的信赖。他的追随者们偏离了共产主义者的传统而走向了僵化的死胡同，而不是真正代表国家了利益。[[154]](#footnote-154)这段描述直白地表明了古巴在革命胜利后重复着东欧斯大林式的列宁主义。而古巴没有规律的全国党代会召开日期同样揭露了古巴共产党缺乏制度，个人崇拜泛滥的问题。[[155]](#footnote-155)

古巴共产党工作的特色：首先，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超过了经济工作；过多的插手于国际地区联盟运动。古巴热衷于和其他体制类似的国家组成区域性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就是一个典型的追随苏联共产国际运动的例子[[156]](#footnote-156)，古巴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际非市场经济地区的贸易联盟来推广古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三，党组织的体制基础仍以阶级斗争为主[[157]](#footnote-157)。这一点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党组织的成员构成，许多来自非公有经济成分的社会成员无法效忠国家成为潜在的党政国家机关干部。而中国共产党则通过三个代表的思想来有效解决了党员组成单极化的问题，使得企业家也可以成为党员。[[158]](#footnote-158)第四，党内对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态度仍然趋于保守。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点特殊的情形影响着古巴共产党的特色和结构以及革命主义情怀的运行。古巴共产党是少有的在革命胜利后才组建的共产党。[[159]](#footnote-159)在执掌政权后，组建党的机构和重建社会主义家园的任务紧紧的交织在一起。这其中将两者相衔接在一起的是军队的军事权威。这种军事权威继续发挥着它的衔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迟来的制度化以及相对弱势的执政党。比如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直到1975年才召开。[[160]](#footnote-160)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党代会上向与会人员强调将党的工作制度化之时，才提出党应当注意意识形态的工作。[[161]](#footnote-161)尽管台面上强调了制度化，台下个人主义的影响依然巨大。当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政国家机关去除个人权威思想时，古巴则是在党内加强个人主义的元素，通过个人权威来重演革命主义情怀并使其从当国家和党体制稳定的粘合剂。在苏联解体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会就在进行维护和调整的反思。对于古巴来说，在1989年之前古巴就坚持一种观点，那就是无论如何党政国家机关要死守革命红线。这种立场直接塑造了古巴共产党及其内部治理的风格。

的确，党的制度化关键在于告别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也是马克思列宁理论对资本主义民主领导体制的批评）而转向集体领导体制从而避免因个人的闪失波及整个政党的事业。先锋政党体制的致命缺点就在于党被个人所摆布，而非个人为党鞠躬尽瘁。

不同于中国，在古巴，个人崇拜问题仍是个微妙的话题。尽管党政国家机关的官方立场是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在核心领导层中，理想与现实是充满差距的。[[162]](#footnote-162) 只有近期劳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大概地谈到了有改观古巴共产党接班人的问题。[[163]](#footnote-163)但是这篇讲话仍然没有触及党的接班人制度化以及改正个人崇拜的问题。至少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而言，在他领导古巴的半个世纪中，古巴的官僚体制不断膨胀，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浓郁。“他不受组织纪律的限制，并且不听令于其他党的干部。”[[164]](#footnote-164)卡斯特罗无人所及的威望被他融于党组织的政权，仿佛中世纪君主的家天下一般，竟也维持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165]](#footnote-165)。但是再高的威望也无法超越生命的终结，领导人的个人威望无法在生命终结后继续支持政权的延续。唯有强而有力的制度化的集体领导体制才可以延续先锋党的政权。[[166]](#footnote-166) 相比较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极高的政治魅力，劳尔·卡斯特罗将面临如何作为第二代领导人建立古巴的接班人制度体系，并依照古巴的国情来发展一套马克思列宁卡斯特罗主义，从而淡化个人主义的色彩。这种制度化的途径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极为关键，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自毛泽东后，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极为重视个人崇拜的问题，并以此来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67]](#footnote-167) 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总结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最近的毛泽东诞辰纪念仪式上，习近平就提到，在一个公正的历史视野下正确看待领导人：

毛泽东作为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168]](#footnote-168)”

许多有关共产党权力制度化体制化的论述都是朝着避免个人崇拜再次出现的方向。[[169]](#footnote-169) 在此基础上的法治关注与国家行政治理方面。由此而来，执政党的轮回交替就可以保持稳定。此外，制度化与法治可以同时推动反腐的进程，包括一种有效的党内纪律处罚手段。[[170]](#footnote-170)

从邓小平以后，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被限制在2个5年当中。古巴第六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但是由于权力交接制度当中的一些缺陷，古巴共产党内的民主仍然难以被表现出来。更为不利的是，相比较中国，古巴是小国更容易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此外，不同于中国已经经历过制度化权力交接，古巴还未真正意义上经历类似经历。中国的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邓小平，离开最高领导人岗位，功成名就。而古巴还没有开始。

尽管如此，劳尔·卡斯特罗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模式的领导人交接班制度。在2013年2月，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了进行换届的制度改革。[[171]](#footnote-171)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效仿邓小平，宣布于2018年退位。 “这意味着他试图改变自卡斯特罗1959年起就确立的换届制度。除了宣布他个人的退休外，他还提到希望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引进任期限制以及年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宪法修正案，哪怕需要由全民公决而来决定。”[[172]](#footnote-172) 不过卡斯特罗还是会很小心的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以保证党政国家机关的利益不会为军队的利益而做出牺牲。[[173]](#footnote-173)

此外，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是两党间在反腐败方面的不同策略。中国共产党是依法，依纪反腐，而古巴共产党是依运动反腐。在中国依靠司法系统和双规制度进行反腐，并且还有诸多党内法规纪律文件，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处分补充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在古巴依靠 “自律，廉洁道德”，特别行动的方式来反腐。古巴的反腐仍然停留在口号上，而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反腐。除非进行制度化，体制来惯例化，程序化反腐，否则腐败仍将是一个困扰，陷入政治性反腐而非良好治理机制。[[174]](#footnote-174)

最后，古巴和中国都面临如何继续推动和发展列宁主义有关党，国家体制的实践。具体而言，两国都在探索如何在党政国家机关间进行分工协作治理国家。古巴仍然继续着列宁主义传统，除了在最高层实行党政合一，其他层级实施党政分离。[[175]](#footnote-175) 早在1973年，劳尔·卡斯特罗就意识到坚持苏联模式的问题。[[176]](#footnote-176) 他讲到，列宁同志曾在1921年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届代表大会上指出：

“作为执政党，党的政府的领导必须统一，也将继续统一。”[[177]](#footnote-177) 在实践当中，党和政府在其他层级的关系是混乱而难以区分的。一些党政国家机关的组成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这种混乱的关系使得共产党难以作为先锋党专注于提供政治领导，而国家机关也因为受到党的干涉而缺乏治理的自主权。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党政国家机关的分工协作。这一改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实践的重大发展与推动。党政国家机关的分工协作早已经在循序渐进中不断进行。其中党的领导是一项独立于宪政/宪法的存在，而国家机关的治理权是通过国家机关实施并受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于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工作相区分以使党更好的发挥其领导。在此基础上，党员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下独享参与政治议题的权利，而党组织则可以通过鼓舞人民的参与来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法律，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原则，但不会反过来作为强制性的法律来约束共产党。[[178]](#footnote-178)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将党内民主机制程序化，制度化并使其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179]](#footnote-179)

VII．意识形态和转型：站在十字路口的古巴

在加强先锋党的革命建设方面面，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180]](#footnote-180) 当然，优于古巴现行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已经实施了半个世纪，要想完全克服也有难度。这使得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不思进取。诞生于1959年革命的古巴共产党没有继续革命，并进行执政党的转型反而投向了保守的政治思想束缚了经济。[[181]](#footnote-181)古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是如此的不同。

1. 古巴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

古巴现在迎来了转型的时刻。即使美国最保守的政治势力也和古巴共产党一样都意识到古巴应当作出变革。两者的分歧点在于变革的性质，以及变革的最终目标。许多西方观察者认为古巴的转型将不可避免的朝向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182]](#footnote-182)古巴共产党内诸多人士则把转型当成一种渐进的开放，但是越窄越好，以保存古巴的立国之本: 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还在雏形的私人经济以及以国家为唯一形式的国际交往。这里两种思潮的大本营一个在迈阿密，一个在古巴。这两种思潮都无法正确反映现实，以及为先锋党指明道路。

在1975年第一届古巴党代会开幕上，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到“当我们分析革命进程时，我们变得不耐心焦虑因为许多没有定论，没有体制化，没有一个定性的未来。”[[183]](#footnote-183) 直至2014年，卡斯特罗也很可能在讨论他自己的革命。任何有关古巴社会云谲波诡变迁的讨论都应当认真考虑古巴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如果对其忽视，将无法把握古巴改革动向的本质及其因意识形态理论缺陷而产生的局限。这一规律同时也适用于美国，意识形态同时也制约着美医疗改革辩论的走向。值得玩味的是美国在这一点上与卡斯特罗站在同一战线上，抢占舆论制高点是任何国家赢得意识形态战斗的关键。[[184]](#footnote-184)

当今的古巴共产党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一个决定古巴未来的发展以及指导思想的时刻。东欧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内在矛盾，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在离开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后都无法继续维持。古巴接受了这种模式并得出了古巴马克思主义，卡斯特罗思想，将古巴的发展定格到了1959年1月1日。这种实践不仅不利于美国以及在美国的古巴裔群体，同时也阻碍了古巴实现其美好的蓝图。过去5年停滞不前的经济改革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正如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新投资法案的问题并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不符合国际发展的潮流，也不是党国家体制。问题出在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结构。 古巴共产党无法转变思路，辩证的理解，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应用到古巴的现实当中。经济改革的问题不是古巴社会太过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古巴共产党没有体现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问题都是古巴共产党自己造成的。[[185]](#footnote-185)僵化的意识形态，个人崇拜的泛滥，老人政治，以及斯大林极权政治下的腐败问题。[[186]](#footnote-186)这些问题不能归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归咎于党国家体制。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古巴改革的挫折使得古巴共产党在第六届代表大会上释放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讯号。

的确，古巴共产党面临转型进程的压力都将在2014年后显得更为强烈，尤其是股吧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宣布对话一结束敌对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也许并非易事，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发生作用。如果这些进程能够产生尘垢，那么将搬走意识形态转型进程上的一个重要障碍：与美国对抗。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国家体制，经济社会进程转型的迟缓将引来人们的非议。

古巴共产党有能力超越自己，做出改变。这意味着古巴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体制建设，革除个人权威，创建党的纪律文化，国家法治。古巴共产党作为先锋党本应当设定政策，由国家机关来实现。但是古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执行了陈旧的指导思想，模糊了法治和政策的边界，模糊了党的领导和国家行政治理的边界。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的实践证明了一个国家是可以发展出一套接受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体制，而没有必要由国家经济政策操控所有的经济活动，党的领导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治理是可以并存的。这种政治开放的空间使得更多普通党员也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之中。如果古巴共产党不接受这些开明的理念，那么古巴的经济改革将停留在对合作经营的管制，由国家控制的毫无生机的死人经济部门，以及通过外资合营来获取财富而不是通过外资来投资国家建设。[[187]](#footnote-187)

B． 意识形态和古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中，他曾提到中古间的社会主义渊源。习近平主席接受劳尔·卡斯特罗授予的“何塞·马蒂”勋章时谈到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将两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 此后，在与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中补充道“中方对中古关系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同古巴永做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188]](#footnote-188)” 这次国事访问突显了中古两国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如何处理经济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思路。有人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和古巴有许多相同之处：共产党都是执政党，政治权力以及国家政策制定权由党来掌握。然而，实际上两者存在诸多不同。

两者之间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党组织的构造和运行之处。这些不同之间影响了国家的进程以及政府的运行。这些比较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古巴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的内在冲突矛盾至关重要。

首先，对比中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没能制度化一套更为现代的组织结构。在劳尔卡斯特罗接班之前，两党之间处理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古巴共产党的立党思想观念出现了僵化，这种僵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经济改革，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相冲突。这实际上抑制了一个有力积极的理论辩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古巴不能得到适时的发展与创新。2011年古巴共产党第六届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就展现了古巴共产党改革的潜力与不足[[189]](#footnote-189)。中国共产党与之相反，将意识形态理论与执政理念的实践相融合，为理论创新提供可能，从而使得马克思列宁理论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先锋党的地位以及中国的国情。

第三，在古巴，党政国家机关之间仍然处于一种胶合的状态，促使了国家治理的不连贯。这种党政不分实际上就是苏联及其东欧国家间实行的党法不分，即党的政治领导与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相互干扰。这种陈旧的治理观念极大的考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能否通过国家机关的治理来创建法制，实现合理的，有规律的统治。与古巴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努力减少党政不分，党的工作正集中到成为先锋政治领导，同时努力实现党内民主工作机制[[190]](#footnote-190)。也基于此，党的政治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行政职责得以分离，从而在促使了党内与国家层面法治的萌发的同时不会越弱党的政治领导。

古巴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差距自然就反映到了社会进程之上[[191]](#footnote-191)。由于古巴共产党思想观念的僵化，（直到现在才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缺乏党政分离，缺乏党内纪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现了停滞。古巴共产党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仍然沉浸于革命胜利的历史时刻。陈旧的反美主义，安于人治，不会通过制度来安排权力。至此使得改革阻力重重，积重难返。中国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较为不同的道路，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中国共产党保持了马克思列宁的传统但是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得传统理论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这些关于两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组织结构以及国家机关运行方面的不同为我们理解两国经济政策的不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些不同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具活力并更加注重如何促动政策以及国家行动的实施。古巴的马克思主义是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脱离了政策制定的考虑，而成为维护旧制度的附庸。中国科学的吗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融合了新的理论维度以反映中国发展的目标，体现了中国不断复杂化的政府体制。古巴仍然挣扎与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沉溺于革命情怀当中。古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反映国家需要，国家现实的意识形态。

VII 结论

本文的主旨包含6大主张。第一，意识形态理论处于古巴议题的核心。但是此处意识形态与西方语境并不是同一概念。本文中的意识形态是一国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文化原则的基础，[[192]](#footnote-192)例如美国政治指导思想的根基就是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这些指导原则也许并不是宪政权力创建，组织，实施的具体正式文件，但是指导着约束着这些宪政权力的创建，组织和实施。

第二，社会主义古巴通过自己的先锋政党，古巴共产党来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巴共产党选择追随东欧苏联的实践道路，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因为理论的实质与实践的需要完全脱节。为了保留革命情怀，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党的指导思想冻结到革命胜利的那一时刻。这种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保守革命情怀为主旨，并被古巴卡斯特罗主义所采用。卡斯特罗主义的核心就是以保守革命情怀为治国理念基础，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外交，外贸政策。[[193]](#footnote-193)

第三，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塑造古巴共产党与国家有着直接的影响。组织文化与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的。而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国家和党，以及对外政策的根基。具体而言，在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下，党和国家机构的相互融合淡化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概念，削弱了法律治理国家的作用而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权威。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古巴共产党安于现状，难以进行体制建设，消除腐败。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古巴共产党成为保守革命情怀的卫道士，拒绝任何理论革新。古巴共产党知道近期才流露出改革的意愿，例如，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分型革命建设的经验。[[194]](#footnote-194)

第四，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有着重大影响。古巴的意识形态理论结构揭示了为何古巴经济改革存在缺陷与不足。 古巴改革动力不足，无法走出自身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恣意管控经济活动的局限，其根本就在于一个推动中央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理念。这种理念下的政府监管实质上就是将权力放任于层级混乱的行政官僚体系之中，而忽视了制度的作用。中国正在逐渐改变这种模式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道路。而按照古巴目前的指导思想，还难以接受中国的这种变革。将ALBA的结构模式和当下新海外投资法结合在一起，将能更好地说明为何古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得非公有制经济改革难以维持。古巴当下的经济改革仍然严控非公有制行业，200多项产业牢牢的被行政审批所把持。

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正如同西方民主和市场制度一样，是可以多远化的。除了哦能够苏联的社会主义，托洛斯基的理论外，中国的后毛泽东时代也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样本，即实现马克斯主义最高理想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事业（科学发展观），列宁主义提供党的组织原则，而后人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195]](#footnote-195)通过和谐发展的指导思想来实现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通过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来强化一个共产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党的指导思想根据国家的现实需要以及先锋党传承革命果实的宪政职责而做出必要的发展。正如党章提到的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196]](#footnote-196)本文并不是要求古巴向复制东欧斯大林主义那样来来复制中国。这里强调的是古巴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在所难免。

第六，古巴将迎来转型。古巴共产党，甚至美国极端保守势力都认为古巴即将迎来变革。双方只是针对变革的本质以及最终的目标不能互相认同。许多西方观察者认为古巴的转型将不可避免的朝向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古巴共产党内诸多人士则把转型当成一种渐进的开放，但是越窄越好，以保存古巴的立国之本: 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还在雏形的私人经济以及以国家为唯一形式的国际交往。这里两种思潮的大本营一个在迈阿密，一个在古巴。这两种思潮都无法正确反映现实，以及为先锋党指明道路。

革命的果实是瞬间取得的，（但是革命的旗帜的飘扬却需要后人的努力）但是先锋党的合法性却是需要却需要政治体制承担责任，实事求是，传承革命。正如2010年阿尔弗雷德·格瓦纳在谈论古巴马克思主义所言：“如果我们要继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转变道路，即使这要花费时间。” [[197]](#footnote-197)本文坚信，无论结果如何，时间将证明一切。这需要执政党拿出勇气，放下架子，抛弃个人崇拜，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中，以及重新定位自己的终极目标。中国已经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古巴必须克服意识形态理论中的各种迷信/谬误，找寻自己的道路。当老的一辈革命者逝去后，古巴终究需要建立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必须根植于古巴本土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资源上，并与其治理的风格向适应。这就要求古巴共产党和古巴另辟蹊径建立理论根基，突破保守的桎梏。只有如此的改革才能产生促进经济改革的概念，而不被当下保守的思潮所干扰。如果没有像样的意识形态改革，经济改革也是难以为继的。而没有改革，只会出现更为激进与破坏的倾向。

1. W. Richard and Mary Eshelman Faculty Scholar & Professor of Law,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e author may be contacted at lcb911gmail.com. I thank my research assistants, Shaoming Zhu (Penn State University SJD expected) and Shan Gao (Penn State University SJD expected) for their excellent work on this essay.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the Plenary Panel: “Cuba’s Reforms: Status and Prospects,”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24th Annual Meeting, "Cuba's Perplexing Changes", Miami Florida, July 31, 2014. My thanks to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is work, to Archibald Ritte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arlton University (Canada)) for his perceptive and challenging comments and to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whose deep engagement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my thinking and hopefully improved this work. [↑](#footnote-ref-1)
2. Ley No. 118 (Ley de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April 2014, published in Granma, Tabloide Especial, April 2014 (hereafter “Ley 118”), officially published in the Gaceta Oficial, Gaceta Oficial No. 20 Extraordinaria de 16 de Abril de 2014, pp. 177-189. Available http://www.cubadebate.cu/wpcontent/uploads/2014/04/GO\_X\_20\_2014\_gaceta-ley-de-inversionextranjera.pdf. [↑](#footnote-ref-2)
3. Ley 118 provided that detailed regulations would be published within 90 days. The Cuban state has tended to treat these deadlines as guidelines. Yet in this case and underlin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easure,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regulations were in fact published with the law in the Gaceta Oficial in which Ley 118 itself appeared. See Consejo de Ministros, Decreto No. 325, Reglamento de la Ley de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Gaceta Oficial, Gaceta Oficial No. 20 Extraordinaria de 16 de Abril de 2014, pp. 189-202. Available

   http://www.cubadebate.cu/wpcontent/uploads/2014/04/GO\_X\_20\_2014\_gaceta-ley-de-inversionextranjera.pdf; Banco Central de Cuba Resolución No. 46/2014, Gaceta Oficial, supra, pp. 202-204; Banco Central de Cuba, Resolución 47/2014, Gaceta Oficial supra, pp. 204; Comercio Exterior y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Resolución 128 de

   2014, Gaceta Oficial, supra, pp. 204-240. [↑](#footnote-ref-3)
4. See, José Manuel Pallí, Analysis: Cuba’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New? Indeed, but Barely, Cuba Standard.com (April 19, 2014). Available https://www.cubastandard.com/?p=10471. [↑](#footnote-ref-4)
5. Id., Arts. 3-4. [↑](#footnote-ref-5)
6. Id., Art. 5. This would create some problems for investors whose home states extend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and bribery laws outward. See, e.g., U.S.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s Act of 1977 (FCPA) (15 U.S.C. § 78dd-1, et seq.). [↑](#footnote-ref-6)
7. Id., art. 9.1. [↑](#footnote-ref-7)
8. Id., art. 10. [↑](#footnote-ref-8)
9. Id., arts. 6.1., 11.1, and Chapter VIII. [↑](#footnote-ref-9)
10. Id., Ch. IV. [↑](#footnote-ref-10)
11. Id., art. 13.Investment through economic association agreements is targeted for the

    natur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services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and tourist

    sectors. I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ventures is defined id., art. 15. [↑](#footnote-ref-11)
12. Id., art. 17. [↑](#footnote-ref-12)
13. See, e.g., PETER T. MICHLINSKI,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LAW 179-191 (2nd Ed., Oxford: 2007). [↑](#footnote-ref-13)
14. See, Ley 118, supra, Chapter VIII. The constraints on approval discretion are quite

    general but differ among the State Council (art. 21.1(2),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Id., art. 21.1(3)-(4). Modifications require the same set of approvals and essentially permit de novo review. [↑](#footnote-ref-14)
15. See, e.g., Art. 19.1. [↑](#footnote-ref-15)
16. Id., Chapter XI. [↑](#footnote-ref-16)
17. Id. Chapter X. [↑](#footnote-ref-17)
18. Id., Chapter XII (offering discounts on local rates or exemptions from local taxes identified).. [↑](#footnote-ref-18)
19. Id., art. 47. [↑](#footnote-ref-19)
20. Id., Chapter XIV. [↑](#footnote-ref-20)
21. See, id., art. 56. [↑](#footnote-ref-21)
22. Id., Chapter XV. [↑](#footnote-ref-22)
23. Id., Chapter XVII [↑](#footnote-ref-23)
24. Id., art. 61 [↑](#footnote-ref-24)
25.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and Augusto Molina, Cub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Global Trade Systems: ALBA and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1(3):679-752 (201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407705. [↑](#footnote-ref-25)
26.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sources in Staliniust states, see, Slavoj Zizek, Stalinism, Lacan.com (1997/2007). Available http://www.lacan.com/zizstalin.htm. (“Critics of such hearsay-scholarship had a point. But what few people seem to realize, even now, is that the salient issue might not be the reliability in Stalin's Soviet Union of word of mouth and political divination, but its pervasiveness. Kremlinology arose not at Harvard, but in and around the Kremlin. . . and it was what everyone in the Soviet Union did to a degree, the more so the higher up.”). [↑](#footnote-ref-26)
27. It was reported in Cubanet that: It is rumored that the recent visit of José Ignacio Lula Da Silva to Cuba,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 of elevated investments from Brazil and the dela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nd in updating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was the definitive touch that made the Cuban cupola decide to push its approval, postponed several times. There are also unofficial rumors about the freezing the Brazilian investments in the Mariel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 and the approval of new credit to the Cuban side, until there are adequate legal safeguards. The agreements are no longer based in solidarity, but rather on purely capitalist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Miriam Celaya, Cuba for Foreigners, Translating Cuba: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uban Bloggers, Havana, March 31, 2014, available http://translatingcuba.com/cuba-for-foreigners-miriam-celay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blog Sin Evación, through Cubanet, March 28, 2014) and available http://www.cubanet.org/destacados/cuba-para-los-extranjeros/. [↑](#footnote-ref-27)
28. Ibid [↑](#footnote-ref-28)
29. See, e.g., Richard Feinberg, Cuba’s New Investment Law: Open for Business, Brookiungs, April 1, 2014. Available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04/01-cuba-foreign-direct-investment-feinberg. [↑](#footnote-ref-29)
30. Ibid (The proof will be in the pudding, and investors will be watching closing for the fine print in the new regula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proval process.”). [↑](#footnote-ref-30)
31. Ibid. [↑](#footnote-ref-31)
32.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or PCC) was forme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forces of Fidel Castro acquired control of the state in January 1959. The first PCC Central Committee was constituted on Oct. 3, 1965. PCC, Histori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available http://www.pcc.cu/i\_historia.php. [↑](#footnote-ref-32)
33. A reference to the group of senior and middle level administrators entrenched within a bureaucracy bent on preserving its power. See, e.g., T.H. Rigby, Staffing USSR Incorporated: The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ra System, 40(4) SOVIET STUDIES 523-537 (1988). The lower ranks of the bureaucracy were filled in late European soviet states with what were colloquially and disparagingly referred to as apparatchiks—full time professional functionaries usually with little or no training in

    their areas of responsibilities. [↑](#footnote-ref-33)
34. Among the interesting analyses is that of Javier Corrales, The Gatekeeper State: Limited Economic Reforms and Regime Survival in Cuba, 1989-2002,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9(2):35-65 (2004), who argues that the Cuban government and Party apparatus survives by restricting and instrumentally using access to capitalist rewards. [↑](#footnote-ref-34)
35. See, e.g., Carmelo Mesa Lago, Models of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02. “Until Fidel dies, Raúl probably will not implement any significant economic policy changes, because of risk of the Maximum Leader’s criticism (via his reflexiones to

    the news media) against deviations from his failed economic legacy.” Carmelo Mesa Lago, The Cuban Economy in 2007-2007, i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ASCE): Cuba in Transition 17:1-20, 18 (2007). [↑](#footnote-ref-35)
36. See, e.g., Lenier González-Mederos, Cuba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Havana Times, August 5, 2014. Available Carmelo Mesa Lago, Panorama de las Reformas Económicos-sociales y sus efectos en Cu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ASCE): Cuba in Transition 23:1-15 (2013). [↑](#footnote-ref-36)
37. See, e.g., Antonio Rodiles and Alexis Jardines, Notes for the Cuban Transi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ASCE): Cuba in Transition 23:323-325 (2013). For a more sympathetic account, see, Vegard Bye, Possibl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uba in the Light of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Comparative Elements,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ASCE): Cuba in Transition 23:50-62 (2013). [↑](#footnote-ref-37)
38. But see, Diego Rosette, Jose Azel discusses Cuba’s transition; life after the Castro  
    brothers, VOXXI, July 2, 2014, available http://voxxi.com/2014/07/02/jose-azeleconomic-transition-cuba/. [↑](#footnote-ref-38)
39. As used in this paper, Castro Theory refers to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Fidel Castro Ruz, and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ruling ideology of the PCC. That Theory would be understood as supplementing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s adopted and practiced by Cuba’s mentor state—the Soviet Union. It is thus to be understood as a contextually

    manifested form of Marxist-Leninist Stalinism, which is the way that it is likely that Castro understood the grounding ideology of the state. Cf., e.g., Larry Catá Backer, Fidel Castro on Deng Xiaoping and Erich Honecker--Understanding the Foundations of Cub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y,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Aug. 19, 2012.

    Available http://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2/08/fidel-castro-on-deng-xiaopingand-erich.html. [↑](#footnote-ref-39)
40. See discussion, infra at Section II.A. [↑](#footnote-ref-40)
41. Cf. Katherine Verdery,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For a perceptive early analysis, see, Jorge I. Dominguez, Cuba: Order and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rge Dominguez, Why The Cuban Regime Has Not Fallen, in Cuban Communism 533-540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ime Suchlicki, eds., 10th e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American Ethnologist 18(3):419-439 (1991). [↑](#footnote-ref-41)
42. For a perceptive early analysis, see, Jorge I. Dominguez, Cuba: Order and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rge Dominguez, Why The Cuban Regime Has Not Fallen, in Cuban Communism 533-540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ime Suchlicki, eds., 10th ed.,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footnote-ref-42)
43. See, e.g., Marifeli Pérez-Stable, Caught in a Contradiction: Cuban Socialism Between Mobi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32(1):63-82 (1999). [↑](#footnote-ref-43)
44. Cf., Anthony Oberschall, The Great Transition: China, Hungary, and Sociology Exit Socialism into the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1028-41 (1996). [↑](#footnote-ref-44)
45. See generally, 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2011). But see, Ken Moriyasu, China 2020 -- Strong, rich and unhappy, Nikkei Asian Review, Dec. 5, 2013. Available <http://asia.nikkei.com/magazine/20131205->Rebalancing-act/Cover-Story/China-2020-Strong-rich-andunhappy?n\_cid=NARAN121. [↑](#footnote-ref-45)
46.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Cub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the Crossroads:

    Cuban Marxism, Private Economic Collectives, and Free Market Globalism, 14:2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337-418 (2004); Larry Catá Backer, . Party, People, Government, and State: On Constitutional Val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hinese State-Party Rule of Law System, 30(1) BOSTON 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31-408 (2012). The CCP has followed

    the path of what it term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otnote-ref-46)
47. The best express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that line was made in 1984 by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une 30, 1984) available <http://academics.wellesley.edu/Polisci/wj/China/Deng/Building.htm>.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e CCP is to build ultimately a communist society. That project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But socialism is understood not in its static and European sense, but as a dynamic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s meant to distribute the fruits of rising prosperity to all sector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deed, socialism is understood a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so much wealth is produced and available that the Communist ideal is then achievable (in the future). Given this founda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CCP and thus of state policy, is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principal objective, then, of all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must be bent toward the great project of creating prosperity. Everything else assumes a secondary role. Unless an objective or policy can be tied to this long-term project of socialism— the elimination of poverty for everyone—it does not support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t follows that such objectives would be of lesser interests to officials i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officials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hese foundational ideological premises find modern expression in the notion of China's dream. See Larry Catá Backer and Wang, Keren, 'What is China's Dream?' Hu Angang Imagines China in 2020 a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ly Embedded Superpower (February 23, 2013). Consortium for Peace & Ethics Working Paper No. 2013-2) available

    http://ssrn.com/abstract=2223279. [↑](#footnote-ref-47)
48. Dougla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1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otnote-ref-48)
49.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ee discussion in Larry Catá Backer, The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 Daibiao (the 'Three Represents'),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Moder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6(1):29-102 (2006). [↑](#footnote-ref-49)
50. Cf. Jo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footnote-ref-50)
51. Cf. Charles Howard McIlwain, Constitution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7). [↑](#footnote-ref-51)
52. Discussed more fully in Larry Catá Backer, The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 Daibiao (the “Three Represents”),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Moder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supra. [↑](#footnote-ref-52)
53. Se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vailable. For a discussion along these lines, see Paul Eidelberg, On the Silenc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6). [↑](#footnote-ref-53)
54.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Fidel Castro refers quite specifically to these notions embedded in the Declaraiton of Independence in his “History will Absolve Me.” See Fidel Castro Ruz, Histry Will Absolve Me Chp. XXXIX (New York: Lyle Stuart 1961) [↑](#footnote-ref-54)
55. iang Zemin st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ory.” Jiang Zemin, Report at the Fif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for an All-Round Advancement of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pt. 12, 1997),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features/45607.htm. [↑](#footnote-ref-55)
56. For an early account, Richard R. Fag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1-1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footnote-ref-56)
57. Liss, supra., 54. [↑](#footnote-ref-57)
58. Fidel Castro Ruz, Las Ideas No Se Matan, Reflexiones del Comandante en Jefe, May 28, 2007, available

    http://www.granma.cu/granmad/secciones/reflexiones/esp-013.html [↑](#footnote-ref-58)
59. See, e.g., John M. Kirk and Michael Erisman, Cuban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Origins, Evolution, Goa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Maxwell A. Cameron,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 Beyond Good and Bad,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2):331-348 (2009. [↑](#footnote-ref-59)
60. See, e.g.,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146 (1990); 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57 U. Cinn. L. Rev. 849 (1988-1989). Originalism does not just manifest itself as a mechanic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 See, Caleb Nelson, Originalism and Interpretive Conven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0(2):519 (2003). More importantly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specific ideology that is meant to preserve a particular moment in time as itself constituted into the act of creating the structures of state. See, e.g., Nicholas Quinn Rosenkranz,

    Federal Rules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115:2085 (2002) (interaction of text and interpretive regime; ibid., 2142). [↑](#footnote-ref-60)
61. Criticized quite famously in 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Original Understanding,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204 (1980). [↑](#footnote-ref-61)
62. See, e.g., Edward A. Purcell, Jr., Originalism,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Enterprise: A Historical Inqui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ernadette Meyler, Towards a Common Law Originalism, Stanford Law Review 59:551 (2006-2007). [↑](#footnote-ref-62)
63. See, e.g., Winifried Brugger, Legal Interpretation, Schools of Jurisprudence, and Anthropology: Some Remarks From a German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42:395, 396-416 (1994). [↑](#footnote-ref-63)
64. See, e.g., Bruce Ackerman,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Harvard Law Review 120(7):1737 (2006); Vicki C. Jackson, Constitutions as ‘Living Trees’?: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Interpretive Metaphors, Fordham Law Review 75:921 (2006-07). [↑](#footnote-ref-64)
65. See, e.g., Peer Zumbansen, Comparative,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The Emergence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Plural Order,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1(1):16-52 (2012). [↑](#footnote-ref-65)
66. Famously, see, e.g., William H. Rehnquist, The Notion of a Living Constitution, Texas Law Review 54(4):693 (1976). [↑](#footnote-ref-66)
67. “Supreme Court Justice Antonin Scalia once remarked that the theory of an evolving," living" Constitution effectively" rendered the Constitution useless." He wanted a" dead Constitution," he joked, arguing it must be interpreted as the framers originally understood”. Davis A. Strauss, The Living Constit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ootnote-ref-67)
68. See, Antonin Scalia, [↑](#footnote-ref-68)
69. Sympathetic outsiders sometimes note this unconsciously in small details that are revealing: in describing Fidel Castro, for example, Sheldon Liss notes that “he almost always wears battle dress as a reminder of the ongoing revolution.” Sheldon B. Liss, Castro!: Castro’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3 (Westview Press, 1994). [↑](#footnote-ref-69)
70. It has been 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 even the forms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gulatory context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ee, e.g., Larry Catá Back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t a Crossroads: The State, the Enterprise, and the Spectre of a Treaty to Bind them All (July 5, 201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462844. [↑](#footnote-ref-70)
71. Oral Commentary of Vegard Bye, Scanteram Norway, made at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Economy 24th Annual Meeting, "Cuba's Perplexing Changes", panel on “Cuba’s Reforms: Status and Prospects,” Miami Florida, July 31, 2014. [↑](#footnote-ref-71)
72. The latter, producing a tendency toward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away from institutional and collective governance, is discussed below, infra text and notes ---. [↑](#footnote-ref-72)
73. The First Congress focused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study of Marxism-Leninism as fundamental to the political order, one grounded in class struggle and internationalism, Congreso del PCC: Tesis y Resoluciones sobre los estudios del marxismo-leninismo en nuestro país (Fuente: Rojas, Ernesto A. Tesis y Resolucion es. Primer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Ciudad de La Habana: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1978. p. 261-293), available .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I-Congreso.-Tesis-y-Resoluciones-sobre-los-estudios-delmarxismo-leninismo-en-nuestro-pa%C3%ADs.pdf. The First Congress’ Platform

    declared:

    Frente a esa situación del sistema capitalista, los países socialistas, basados en la

    comunidad de su régimen económico-social, de su ideología y de sus principales

    objetivos, constituyen un sistema mundial en cuyo seno no se producen crisis

    económicas y en el cual se desarrolla un nuevo tipo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basadas en la completa igualdad de derechos de todos sus integrantes, el respeto a la

    soberanía, la independencia y los intereses de cada país; la ayuda mutua y la

    colaboración fraternal y recíproca, donde ningún país tiene, ni puede tener, derechos a

    privilegios especiales.

    I Congreso del PCC: Tesis y Resoluciones, Sobre la Plataforma Programática del

    Partido, Tesis, Part II (Fuente: Plataforma Programátic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Tesis y Resoluciones. Ciudad de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1978. p. 3-126)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3/ICongreso-PCC.-Tesis-y-Resoluciones-sobre-la-Plataforma-Program%C3%A1ticadel-Partido.pdf. [↑](#footnote-ref-73)
74. Congreso del PCC: Tesis y Resoluciones sobre los estudios del marxismoleninismo en nuestro país, available .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I-Congreso.-Tesis-y-Resoluciones-sobre-los-estudios-> delmarxismo-leninismo-en-nuestro-pa%C3%ADs.pdf (“Se requiere comprender, señalaba Fidel «qué el marxismo-leninismo no es una doctrina muerta, que no es catecismo, que no es un esquema que llega y se le pone a cualquier problema... es un, método, una guía, es un instrumento, que precisamente tiene que usarlo el revolucionario en la solución concreta de los problemas que se le presentan, es una doctrina viva que al individuo lo arma, lo prepara, lo capacita, lo lleva a resolver adecuadamente los problemas».”). [↑](#footnote-ref-74)
75. II Congreso del PCC: Resoluciones, Sobre la Lucha Ideológica (Fuente: Resoluciones aprobadas por el II Congreso, p. 392-405),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3/II-Congreso-PCC.-

    Resoluciones-sobre-la-Lucha-Ideol%C3%B3gica.pdf. The ideologicalemphasis is firmlñy tied to Maxism-Leninism and to the thought of Fidel Castro (“Los cuadros y activistas del frente ideológico deben conceder primordial importancia a la necesidad de incrementar el estudio y difusión del marxismo-leninismo en las masas y muy

    especialmente entre los trabajadores, a la consolidación de sus convicciones revolucionarias, al estudio y dominio de la política del Partido, expresada en sus documentos, resoluciones Y en las intervenciones del compañero Fidel Castro y otros dirigentes del Partido y el Estado.”). [↑](#footnote-ref-75)
76. rigentes del Partido y el Estado.”).

    76 I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Informe Central) (from Informe

    Central. I, II y II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Editora Política, La Habana, 1980. (pp. 247-406.))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1/documentos/informecentral-ii-congreso-del-pcc.pdf (the main strength of a small country like Cuba is not military, not economic, is the moral spirited of pursuing independence; a real communists: heroism, self-sacrifice, the spirit of solidarity, delivery, denial and decisio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cause, an unprecedented selfless commitment). [↑](#footnote-ref-76)
77. Like the 6th Party Congress in 2011, this one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worker input into the guidelines (Lineamientos) the for 1986-1990 five year plan.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III-Congreso-PCC.-Resoluciones-sobre-la-pol%C3%ADtica-internacional.pdf.

    Convocatoria al Tercer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From Granma, 2 de

    enero de 1985, p. 1)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3/Convocatoria-al-Tercer-Congreso-del-Partido-Comunistade-Cuba.pdf. Cuban internationalism remained firmly anchored in the Soviet block

    and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 III Congreso del PCC: Resoluciones sobre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From Resoluciones aprobadas por el Tercer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Editora Política, 1986. p. 61-74), available [↑](#footnote-ref-77)
78. Described in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El Comandante En Jefe Fidel Castro Ruz, Primer Secretario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Y Presidente De Los Consejos De Estado Y De Ministros, En La Inauguracion Del Iv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Efectuada En El Teatro "Heredia", Santiago De Cuba, El Dia 10 De Octubre De 1991.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Discurso-de-Fidel-inauguracion-del-IVcongreso.pdf. [↑](#footnote-ref-78)
79.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congress ratified: “de nuestra gloriosa historia brotaron y brotan los principios emancipadores por cuya victoria han luchado sucesivas generaciones.” V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El Partido De La Unidad, La Democrac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 Que Defendemos La Revolución

    es una sola (from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Sitio Oficial. [en línea] Disponible en: http://www.pcc.cu/congresos\_asamblea/cong5.php).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3/Partido-Unidad-DemocraciaV-Congreso.pdf. [↑](#footnote-ref-79)
80. See discussion, infra at text and notes --. [↑](#footnote-ref-80)
81. Criticized in Thomas Grey, Do We Have an Unwritten Constitution?, Stanford Law Review 27;: 703 (1975), and complicated in H. Jefferson Powel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 Harvard Law Review 98:885 (1985). [↑](#footnote-ref-81)
82. Maurice Zeitlin, 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the Cuban Working Class 27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footnote-ref-82)
83. See, e.g., Lillian Guerra, The Myth of José Martí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footnote-ref-83)
84. See, especially, José Martí, Nuestra América available http://www.ciudadseva.com/textos/otros/nuestra\_america.htm (originally published La Revista Ilustrada de Nueva York - 10 January 1891). [↑](#footnote-ref-84)
85. See, e.g., essays in Mauricio A. Font and Alfonso W. Quiroz, et al., eds., The Cuban Republic and José Martí: Reception and Use of a National Symbol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5). See also, Larry Catá Backer, From Hatuey to Che: Indigenous Cuba Without Indians and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33(1) American Indian Law Review 201-238 (2008-2009). [↑](#footnote-ref-85)
86. Martí, for example had spent much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rote much about his experiences here, recasting these as lessons for a to-be-emerging Cuban state. See, e.g., John M. Kirk, José Martí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Further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9(2):275-290 (1977). [↑](#footnote-ref-86)
87. See, Martí, Nuestra América, supra. [↑](#footnote-ref-87)
88. See, e.g., Richard B. Grey, José Martí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Cuba,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5(2):249-56 (1963). [↑](#footnote-ref-88)
89. For an example, see, Fidel Castro Ruz, On Imperialist Globalization (Zed Books 1999); See also, Larry Catá Backer and Augusto Molina, Cub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Global Trade Systems: ALBA And Free Trade In The Americas, 31(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79-752 (2010). [↑](#footnote-ref-89)
90. These were most in evidence in the support of Cuba to Angolan, Nicaraguan and other “liberation” movements through the 1980s. See, Fidel Castro Ruz, On Behalf of the Movement of Nonaligned Countries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Oct. 12, 1979), in Fidel Castro Reader (Ocean Press, 2008).

    91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 Debt: Cuba and the IMF, 24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497-561 (2006). [↑](#footnote-ref-90)
91.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 Debt: Cuba and the IMF, 24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497-561 (2006). [↑](#footnote-ref-91)
92. Fidel Castro Ruz, Revolución Cubana: ‘Las Ideas no Se Matan,’” July 26, 2013, Reflexiones del Compañero Fidel, in Contralínea, available http://contralinea.info/archivo-revista/index.php/2013/07/29/revolucion-cubana-lasideas-se-mata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Revolución […] es luchar con

    audacia, inteligencia y realismo; es no mentir jamás ni violar principios éticos; es

    convicción profunda de que no existe fuerza en el mundo capaz de aplastar la fuerza

    de la verdad y las ideas. Revolución es unidad, es independencia, es luchar por

    nuestros sueños de justicia para Cuba y para el mundo, que es la base de nuestro

    patriotismo, nuestro socialismo y nuestro internacionalismo.” [↑](#footnote-ref-92)
93. Theodore Draper, Castro and Castroism, in Fidel Castro’s Personal Revolution in Cuba: 1959-1973 33-40, 35 (James Nelson Goodsell, ed., New York: Alfred Knbopf 1975). [↑](#footnote-ref-93)
94. Ibid., 35-39 [↑](#footnote-ref-94)
95. PCC Constitution Cap. I (“lucha por consolidar una moral en la sociedad cubana, cimentada en la ideología de la Revolución, el patriotismo, el colectivismo, la solidaridad, la igualdad de derechos y oportunidades, la justicia social, la confianza mutua, la disciplina consciente, la modestia, la honradez, el espíritu crítico y autocrítico, la seguridad en el porvenir socialista; en consecuencia, combate resueltamente la exaltación de la ideología burgues a, el individualismo, la supervivencia de prejuicios raciales y discriminatorios de cualquier índole, el escepticismo, la falta de fe en el socialismo, las tendencias liberaloides, el derrotismo, el populismo, el oportunismo, el nepotismo, el hipercriticismo, la simulación y la doble moral, el paternalismo, el igualitarismo,

    la indisciplina, la corrupción, las ilegalidades y toda forma de conducta delictiva y antisocial.”). [↑](#footnote-ref-95)
96. Lineamientos, supra, ¶ 1. [↑](#footnote-ref-96)
97. Ibid. [↑](#footnote-ref-97)
98. Ibid., ¶ 2. [↑](#footnote-ref-98)
99. Ibid., ¶ 3. [↑](#footnote-ref-99)
100. Ibnid., ¶5. [↑](#footnote-ref-100)
101. Ibid., ¶¶ 4, 6. [↑](#footnote-ref-101)
102. Ibid., ¶¶11-12. [↑](#footnote-ref-102)
103. Ibid., 7 [↑](#footnote-ref-103)
104. Ibid., ¶ 96. [↑](#footnote-ref-104)
105. Ibid., 97. [↑](#footnote-ref-105)
106. Ibid., ¶ 104. [↑](#footnote-ref-106)
107. Ibid., ¶ 99. [↑](#footnote-ref-107)
108. Ibid., ¶ 140. [↑](#footnote-ref-108)
109. Ibid., ¶¶163-164 [↑](#footnote-ref-109)
110. Ibid., 215 et seq. [↑](#footnote-ref-110)
111. For a summary, see, e.g., Omar Everleny Pérez Villanueva, Cuba’s Economic Reforms: An Overview, published in PERSPECTIVES ON CUBAN ECONOMIC [↑](#footnote-ref-111)
112.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Stalinism in Cuba’s approach to and resistance of globalization, see, infra at Part II.C. [↑](#footnote-ref-112)
113. Larry Catá Backer, Cub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the Crossroads: Cuban Marxism, Private Economic Collectives, and Free Market Globalism,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14(2):337-418 (2004). [↑](#footnote-ref-113)
114. See Victoria Burnett, Cuba Hits the Wall in a 2-Year Push to Exp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12.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12/07/17/world/americas/economists-questioncubas-commitment-to-privatizing-businesses.html?pagewanted=all (“Those awaiting measures to create even more opportunity for private business got the opposite last week, when news spread of a little-advertised government decision

     to charge steep customs duties on the informal imports, from Miami and elsewhere, that are the lifeblood of many young businesses. “This could have a huge impact,” said Emilio Morales, president of the Miami-based Havana Consulting Group, who said state-owned shops in Cuba were losing business to street vendors. “It shows the state isn’t ready to compet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footnote-ref-114)
115.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The Cooperative as a Proletarian Corporation: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Cuba,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33:527-618 (2013). [↑](#footnote-ref-115)
116. See Consejo de Estado Decreto-Ley Número 305 [Council of State DecreeLaw Number 305]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53, Dec. 11, 2012, at 249) (Cuba) [hereinafter Decreto-Ley No. 305]; Consejo de Estado DecretoLey Número 306 [Council of State Decree-Law Number 306]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53, Dec. 11, 2012, at 254) (Cuba) [hereinafter DecretoLey No. 306]; Consejo de Ministros Decreto No. 309 [Council of Ministers Decree No. 309]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53, Dec. 11, 2012, at 260) (Cuba) [hereinafter Decreto No. 309]; Ministerio de Económica y Planificación Resolución No. 570/12 [Minister of Economics and Planning Resolution No. 570/12]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53, Dec. 11, 2012, at 270) (Cuba) [hereinafter Ministerio de Económica y Planificación Resolución No. 570/12]; Ministerio de Finanzas y Precios Resolución No. 427/12 [Minister of Finances and Pricing Resolution No. 427/12]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53, Dec. 11, 2012, at 273) (Cuba) [hereinafter Ministerio de Finanzas y Precios Resolución No. 427/12].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regulations, see O. Fonticoba Gener, Cambio a la ac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Updating Changes to the Economic Model], GRANMA (Dec.

     11, 2012) (Cuba), http://www.granma.cubaweb.cu/2012/12/11/nacional/artic01.html [↑](#footnote-ref-116)
117. The case of the Cabildo nightclub provided a case in point. See, Marc Frank, In Cuba an Opera Singer Builds an Empire, REUTERS (July 11, 2012, 5:08 P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7/11/us-cuba-theater-reformidUSBRE86A1B620120711. [↑](#footnote-ref-117)
118. Richard Feinberg, Havana Bars: The Next Wave of Private Innovation, Cuba Standard May 7, 2014. Available

     http://www.cubastandard.com/2014/05/07/havana-bars-the-next-wave-ofprivate-innovation/. [↑](#footnote-ref-118)
119. [↑](#footnote-ref-119)
120. Victoria Burnett, Cuba Hits the Wall in a 2-Year Push to Exp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12.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12/07/17/world/americas/economists-questioncubas-commitment-to-privatizing-businesses.html?pagewanted=all (“As the private sector has grown, so has the deluge of goods brought to Cuba each day in suitcases and duffel bags, principally from Panama, Ecuad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ain. With no access to a wholesale market, Cubans turn to friends, relatives and so-called mules for everything from food to trinkets to iPhones. This parallel trade has ballooned to more than $1 billion per year, Mr. Morales estimates,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gan loosening of restrictions on travel and remittances in 2009. Yunilka Barrios, who sells sunglasses, hairbands, nail polish and glittery bra straps from a rimy, narrow doorway, was alarmed by the prospect of a 100 percent tax on informal imports that the government indicated would go into effect in September. “Things seem to be tightening up,” she said.”) [↑](#footnote-ref-120)
121. [↑](#footnote-ref-121)
122. See, José Álvarez,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cialist Cuba: Uncertain Real Profits for Foreign Capital and Continued Exploit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 Cuba, May 1, 20’14. Available http://www.fhrcuba.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FHRC-final-ForeignInvestment-Report-5\_09\_14.pdf. Discussed in Juan O. Tamayo, Report Says Cub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violates international labor agreements, The Miami Herald, May 9, 2014. Available http://www.miamiherald.com/2014/05/09/4108310/report-says-cubas-newforeign.html (“The professor sai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pproved by the country’s parliament earlier this year violates at least seven international labor agreements and declarations approv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footnote-ref-122)
123. See Richard Feinberg, Cuba's New Investment Law: Open for Business?, Brookings, UpFront, April 1, 2014. Available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04/01-cuba-foreign-directinvestment-feinberg. [↑](#footnote-ref-123)
124. Ibid. (“The proof will be in the pudding, and investors will be watching closing for the fine print in the new regula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proval process.”). [↑](#footnote-ref-124)
125. Tax rates have been subvstantially cut. See Factbox: What’s Changed in Cub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Reuters, March 29, 2014. Available http://news.yahoo.com/factbox-whats-changed-cubas-foreign-investment-law-195310494--sector.html. [↑](#footnote-ref-125)
126. For a criticism of Ley 118 from what appears to be the Cuban left, see Eddy Carbajal Rodriguez, More Dirt of Cuba’s Foreign Investment Law, Havana Times, May 12, 2014. Available http://www.havanatimes.org/?p=103572 (“The socialism allegedly being built in Cuba will continue to be called socialism, even though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privately own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We will continue to be socialists because that small group of people is made up of foreigners and not Cubans.”). For contra,see William M. LeoGrande, Cub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s a Bet on the Future, World Politics Review, April 2, 2014. Available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3671/cuba-s-new-foreigninvestment-law-is-a-bet-on-the-future. [↑](#footnote-ref-126)
127. Ibid.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ynonymous with social growth.”). [↑](#footnote-ref-127)
128. [↑](#footnote-ref-128)
129. Constitu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Program, available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7-10/25/content\_6944738.htm. [↑](#footnote-ref-129)
130. “We Cuban revolutionaries have committed errors, and we will continue making them. But we will never make the mistake of being traitors," said Castro, 84,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state-controlled press.” Revolutionary standard-bearer Fidel Castro admitted Thursday that Cuba's leaders had made mistakes over the years but insisted they had never betrayed their communist ideals, Times Live (South Africa), Jan. 20, 2011, available http://www.timeslive.co.za/world/2011/01/20/castro-admits-mistakes-weremade. [↑](#footnote-ref-130)
131. See Deng Xiaoping, Uphold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March 30, 1979, availabl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dengxp/vol2/text/b1290.html (“keep to the socialist road; uphol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f uphold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footnote-ref-131)
132. Ibid. [↑](#footnote-ref-132)
133. Ibid. [↑](#footnote-ref-133)
134. “What we consistently take as our guide to action ar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the scientific system formed by these tenets. When it comes to individual theses, neither Marx and Lenin nor Comrade Mao could be immune from misjudgements of one sort or another. But these do not belong to the scientific system formed by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Ibid. [↑](#footnote-ref-134)
135.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hang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As late as 1969, it was clear that what was to emerge as the theory of the mobiliz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fo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as view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lass struggle based ideological posture of the CCP line. See Hung Hsuehping, Revolutionary Mass Criticism: The Essence of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o Oppos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Beijing Review 12(38):5-8 (1969. Available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ProdForDet.pdf [↑](#footnote-ref-135)
136. Robert Lawrence Kuhn,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The New York Tines, June 4, 2014,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13/06/05/opinion/global/xijinpings-chinese-dream.html?pagewanted=all (“Xi’s Chinese Dream is described as achieving the “Two 100s”: the material goal of China becoming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by about 2020,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goal of China becoming a fully developed nation by about 2049,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Chinese Dream has four parts: Strong China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diplomatically, scientifically, militarily); Civilized China (equity and fairness, rich culture, high morals); Harmonious China (amity among social classes); Beautiful China (healthy environment, low pollution).” Ibid.) [↑](#footnote-ref-136)
137.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The Cooperative as Proletarian Corporation: Property Rights Between Corporation, Cooperatives And Globalization In Cuba,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33:527-618 (2013). [↑](#footnote-ref-137)
138. Chinese Premier Meets Cuba’s First Vice President, Xinhua, June 19, 2013. Available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206972/206976/8290188.html. [↑](#footnote-ref-138)
139. The General Progra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stitution provides

     in part: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the path to a stronger China. Only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enable China, socialism and Marxism to develop themselves. The Party must carry out fundamental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at hamp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keep to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t must als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and reform in other fields. [↑](#footnote-ref-139)
140. Ibid. [↑](#footnote-ref-140)
141. On my sen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ee discussion in Larry Catá Backe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The "Go West" (⻄部⼤开发) Policy as Template,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July 14, 2014. Available <http://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4/07/socialistmodernization-and-chinas.html>. [↑](#footnote-ref-141)
142.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Odious Debt Wears Two Faces: Systemic Illegitimacy,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Traditional Odious Debt Conceptions in Globalized Economic Regimes, Duke Journal of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70:1-46 (2007); Larry Catá Backer,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 Debt: Cuba and the IMF,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4:497-561 (2006).. [↑](#footnote-ref-142)
143. Chinese Premier Meets Cuba’s First Vice President, Xinhua, June 19, 2013. Available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206972/206976/8290188.html. Miguez Diaz-Canel, Cuban First Vice President, in Beijing for a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bilateral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 related that “the Cuban side is ready to increase high-level interactions,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governance and deepen pract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areas including trade,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tele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tourism.” Ibid. [↑](#footnote-ref-143)
144. Discussed more fully in Larry Catá Backer, Crafting a Theor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onsidering Hu Angang’s Theory of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merging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tate, 16(1)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ournal 16(1):– (forthcoming 2014). [↑](#footnote-ref-144)
145. Indeed Lenin began one of his most influential Works by confronting the issue of theoretical ossification in Marxism—in 1901! See, Vladimir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9, 1943) (in the context of freedom of criticism, pp. 12-25). [↑](#footnote-ref-145)
146. Sheldon B. Liss, Castro!: Castro’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supra 4. [↑](#footnote-ref-146)
147. Vladimir 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11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29, 1943) [↑](#footnote-ref-147)
148. See, e.g., H. Michael Erisman, Cub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natomy of a Nationalistic Foreign Policy 8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footnote-ref-148)
149. Larry Catá Backer, Crafting a Theor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supra. [↑](#footnote-ref-149)
150. Joseph Fewsmith, Studying the Three Represent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8 Hoover Institute. Available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8\_jf.pdf; citing Jiang Zemin, Speech Given on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uly 1, 2001. Available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10726/433646.htm. [↑](#footnote-ref-150)
151. Jiang Zemin, Build a Well Off Society in an All Around Way 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ort to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CP (2002). Available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211/18/eng20021118\_106983.shtml. [↑](#footnote-ref-151)
152. See, e.g., Eusebio Mujal-Léon and Joshua W. Busby,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Regime Change in Cuba, in Cuban Communism, 1959-2003, pp. 491-512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ime Suchlicki, ed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footnote-ref-152)
153. But not without some questioning coming very recently, and quite tentatively. See e.g., W.T. Whitney, Jr., Cuba, Culture and the Battle of Ideas, People’s World, April 25, 2014. Available http://peoplesworld.org/cuba-culture-and-thebattle-of-ideas/ (“For [philosophy professor 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 ‘economic subjugation to the USSR" led to a ‘profound bureaucratization of Cuba's revolutionary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persisted even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the late 1980's. The Soviet bloc fell and Cuba entered the Special Period, yet ‘no ideological struggle developed to confront the worldwide discrediting of socialism and defend Cuban socialism.’”). [↑](#footnote-ref-153)
154. Sheldon B. Liss, Castro!: Castro’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supra 3. [↑](#footnote-ref-154)
155. The PCC has held six Party Congresses at irregular intervals since 1959. See,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Congresos del Partido Comuinista de Cuba, available http://www.pcc.cu/cong\_asamb.php. In contrast, the CCP has held party congresses at regular four-year intervals almos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N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Congress Review. Available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206972/207190/index.html [↑](#footnote-ref-155)
156. See, e.g., Jia Hepeng. The Three Represents Campaign: Reform the Party or Indoctrinate the Capitalists?, Cato Journal 24(3):261-275 (2004). Available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4/11/cj24n3-5.pdf. [↑](#footnote-ref-156)
157. Contrast the CCP Communist Party Constitution General Program which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struggle, but which contextualizes class struggle within the broader objective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ootnote-ref-157)
158. See, e.g., Jia Hepeng. The Three Represents Campaign: Reform the Party or Indoctrinate the Capitalists?, Cato Journal 24(3):261-275 (2004). Available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4/11/cj24n3-5.pdf. [↑](#footnote-ref-158)
159. See, e.g.,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daptation, Succession, and Transition 3 (Institute for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2002). [↑](#footnote-ref-159)
160. See I Congreso del Partido Comiunista de Cuba, available http://www.pcc.cu/cong1.php. [↑](#footnote-ref-160)
161. Fidel Castro Ruz,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el Comandante en Jefe Fidel

     Castro Ruz, primer secretario del Comite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y primer ministro del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en el acto en que le fueran entregados los compromisos del pueblo en saludo al Primer Congreso del Partido por parte de los dirigentes de las organizaciones de masas, en el Palacio

     de la Revolucion, el 29 de mayo de 1975,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DISCURSO-DE-FIDELEN-EL-ACTO-EN-QUE-LE-FUERAN-ENTREGADOS-LOSCOMPROMISOS-DEL-PUEBLO-EN-SALUDO-AL-PRIMER-CONGRESODEL-PARTIDO.pdf (“estamos seguros de que después de nuestro Congreso eso ya será todavía más sólido, más seguro, y que los principios más puros del

     marxismo-leninismo, los principios más profundos de nuestra Revolución se aplicarán de manera consecuente, que esta generación revolucionaria habrá dejado las bases, y que permitirá a los jóvenes y a los niños del futuro seguir, como herederos de esta Revolución, la marcha victoriosa de nuestra patria hacia el futuro.”). [↑](#footnote-ref-161)
162. See, e.g., The Castro Cult: Fidel’s Fanclub, The Economist, April 26, 2011. Available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americasview/2011/04/castro_cult>. [↑](#footnote-ref-162)
163. See, Marc Frank, Cuba’s Raúl Castro Promises Succession Has Started,

     Reuters, July 26, 2013. Available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7/26/us-cuba-castro-anniversaryidUSBRE96P0UD20130726 ("’There is a slow and orderly transfer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 to the new generations,’ he said, stating the changes were ‘based on the demonstrated preparation and capacity to maintain high the flags of th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 Castro has criticized his own generation for not preparing a succession, called for term limits and has made development of new leaders a priority since taking over for his brother, who ruled the country for nearly 50 years.” Ibid.). [↑](#footnote-ref-163)
164. Eusebio Mujal-Léon and Joshua W. Busby,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Regime Change in Cuba, in Cuban Communism, 1959-2003, supra., 494-495. “Castro’s continuing presence and his constant exhortations to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ideology place strict, if formally undefined, limits on how far government and Party functionaries can deviate from the official canon of nationalism, anti-capit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bid., 500 [↑](#footnote-ref-164)
165. See, Eusebio Mujal-Léon and Joshua W. Busby,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Regime Change in Cuba, in Cuban Communism, 1959-2003, pp. 491-512 (Irving Louis Horowitz and Jaime Suchlicki, ed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Fidel Castro’s 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leadership skills have enabled the regime to retain its capacity for mobilization and to forestall a complete loss of ideological vigor.” Id., 505). [↑](#footnote-ref-165)
166. See, e.g., Antoni Kapcia, Planning for Succession in Cuba: The Long ‘AntiTransition’, Whitehead J.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43 (2008); Brain Latrell, The Cuban Military and Transition Dynamic, Institutte for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2002), available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cs231.pdf. [↑](#footnote-ref-166)
167. Indeed this has been a subject of importance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CP’s ideological line as it moves away from personality as the driver of politics and focuses on 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rules. See, e.g., Mo Zhang,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Discourse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a Bitter Experience, Templ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24:1 (2010). As the discussion at the 18th CCP Party Congress suggests, the efforts to develop Socialist Rule of Law remains very much a work in progress. [↑](#footnote-ref-167)
168. Mao Zedong made 'mistakes', say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ess Trust of India, Dec. 26, 2013. Available http://www.ndtv.com/article/world/maozedong-made-mistakes-says-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463497. See 1980: Deng Xiaoping comments on Mao Zedong Thought,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5 Oct. 2007. Available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congress/229773.htm. [↑](#footnote-ref-168)
169. Hu Angang,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China (Beijing, Tsinghu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13), criticizing Mao Zedong’s personal leadershiop style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s a resul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as downgraded to an institution that simply implemented the personal instructions of Mao Zedong. The membership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went frequent changes in a non-institutionalized manner;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CPC was seriously impaired, and existed in name only.” Ibid., 26. [↑](#footnote-ref-169)
170.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and Keren Wang, The Emerging Structures of 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Laojiao and Shuanggui)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Order,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23(2):251-341 (2014) [↑](#footnote-ref-170)
171. See Damien Cave, Raúl Castro Says his New 5-Year Term as Cuba’s President Will be His Las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4, 2013.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13/02/25/world/americas/raul-castro-to-step-downas-cubas-president-in-2018.html?\_r=0. [↑](#footnote-ref-171)
172. Ibid. [↑](#footnote-ref-172)
173. Ibid. (““He was a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 for Villa Clara and Holguin provinces, where there were important openings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in tourism,” said Mr. López Levy. He added that Mr. Díaz-Canel often worked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which has taken an expanded role in tourism under Raúl Castro. “In that sense,” Mr. López Levy said, “he will face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to prepare a smooth landing for a new typ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footnote-ref-173)
174.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Corruption in Cuba--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Signals Public Recognition and Party Obligation,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July 16, 2011, available

     http://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1/07/corruption-in-cuba-cubancommunist.html; Larry Catá Backer, Juan Tamayo on the Quickening Pace of Publicly Confronting Corruption in Cuba Law at the End of the Day, Aug. 15,

     2011, available http://lcbackerblog.blogspot.com/2011/08/juan-tamayo-onquickening-pace-of.html. [↑](#footnote-ref-174)
175. See Constitution of Cuba, Art. 5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 Martian and of Marxist-Leninist, the organized vanguard of the Cuban nation, is the superior leading forc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organizing and guiding the common efforts aimed at the highest goal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advancement toward the communist society.”). Available

     http://www.constitutionnet.org/files/Cuba%20Constitution.pdf. [↑](#footnote-ref-175)
176. See Raúl Castro Ruz,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 Speech given to cadres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 May 4, 1973. Available http://www2.pslweb.org/site/News2?page=NewsArticle&id=6395&news\_iv\_ctrl=1222. [↑](#footnote-ref-176)
177. Ibid. (“Fidel expressed the same position during an August 1970 meeting: "The only place where absolute subordination occurs is at the highest level, because it must obligatorily occur ther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y has maximum responsibility in administration."” Ibid.). [↑](#footnote-ref-177)
178.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and Keren Wang, The Emerging Structures of 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tra-Judicial Detention (Laojiao and Shuanggui) and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Order,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23(2):251-341 (2014). [↑](#footnote-ref-178)
179. See, Hu Angang,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China (Beijing: Tsinghu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13). [↑](#footnote-ref-179)
180. Ibid., 80. [↑](#footnote-ref-180)
181. “Why has reform—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been so half-hearted in contemporary Cuba? Why has Cuba not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China or Vietnam in enacting more thoroughgoing market reforms that could galvanize its economy? The enduring vitality of ideology 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swer. . . . Castro has consistently developed rhetorical strategies fo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umption with an eye toward defending the ideal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national project.” Eusebio Mujal-Léon and Joshua W. Busby, Much Ado About Something?: Regime Change in Cuba, in Cuban Communism, 1959-2003, supra., 499-500. [↑](#footnote-ref-181)
182. See, e.g., Edward Gonzalez, After Castro: Alternative Regimes and U.S. Policy, Institute for Cuban and Cuban-American Studies (2002). [↑](#footnote-ref-182)
183. Fidel Castro Ruz,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el Comandante en Jefe Fidel Castro

     Ruz, primer secretari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y primer

     ministro del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en el acto en que le fueran entregados los

     compromisos del pueblo en saludo al Primer Congreso del Partido por parte de los

     dirigentes de las organizaciones de masas, en el Palacio de la Revolución, el 29 de

     mayo de 1975," [Speech by Commander in Chief Fidel Castro Ruz,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 and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the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leaders of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masses conveyed the undertakings of the nation in salutation to

     the First Party Congress in the Palace of the Revolution] AÑO DEL PRIMER

     CONGRESO. Available http://congresopcc.cip.cu/wpcontent/uploads/2011/02/DISCURSO-DE-FIDEL-EN-EL-ACTO-EN-QUE-LEFUERAN-ENTREGADOS-LOS-COMPROMISOS-DEL-PUEBLO-EN-SALUDOAL-PRIMER-CONGRESO-DEL-PARTIDO.pdf (in the original: “Cuando nosotros

     analizamos otros procesos revolucionarios, nos angustiamos porque no se consolidan,

     porque no se institucionalizan, porque no implican garantía del futuro.”). [↑](#footnote-ref-183)
184. See, e.g., Mauricio A. Font, Cuba and Castro: Beyond the ‘Battle of Ideas’, in

     A Changing Cuba in a Changing World 43-72 (Mauricio A. Fount, ed., New York: Bildner Center for Western Hemisphere Studies, 2008) available http://www.gc.cuny.edu/CUNY\_GC/media/CUNY-GraduateCenter/PDF/Centers/Bildner%20Center%20for%20Western%20Hemisphere%20Studies/CubaBOOK2008-frombackup.pdf#page=57. [↑](#footnote-ref-184)
185. See, e.g., Arturo Lopez-Levy, Communist Party Must Do More to Spur Cuba Reforms, Fox News Latino, Nov. 19, 2011. Available http://latino.foxnews.com/latino/politics/2011/11/19/scholar-communist-partymust-do-more-to-spur-cuba-reforms/ (“But, according to Lopez-Levy, the type of change insinuated by President Raul Castro's reform plan requires a party that not only "wears the mantle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historical path (the island has taken since 1959), but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task of promoting that reform.". . . "That involves more significant political changes that do not mean the (end of the one-party system) or anything of the sort, but do imply a more dynamic role for the party as a vehicle of change,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expert said.”). [↑](#footnote-ref-185)
186. Cf., Slavoj Zizek, Stalinism, Lacan.com (1997/2007). Available http://www.lacan.com/zizstalin.htm. [↑](#footnote-ref-186)
187. And thus the caution expressed in Miriam Celaya, Telaraña para atrapar inversionistas: Resta ver cuántos empresarios incautos caerán en las turbias redes de la nueva Ley de 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CubaNet, (viernes, abril 4, 2014). Available http://www.cubanet.org/opiniones/telarana-para-atraparinversionistas/. [↑](#footnote-ref-187)
188. Francisco Jara, China’s Xi Ends Latin American Tour at Cuba Barracks, Yahoo News, Juky 23, 2014. Available http://news.yahoo.com/chinas-xivenezuela-seeking-trade-oil-deals-111011539.html. [↑](#footnote-ref-188)
189. 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18 April 2011, adopted by the VIth Congress of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available http://www..juventudrebelde.cu/file/pdf/suplementos/lineamientospolitica-partido-cuba.pdf [↑](#footnote-ref-189)
190. See Hu Angang,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China (Beijing, Tsinghu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13); discussed in Larry Catá Backer, Crafting a Theory of Socialist Democracy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Considering Hu Angang’s Theory of Collective Presiden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merging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tate, 16(1)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ournal 16(1):– (forthcoming 2014).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为21世纪的中国设计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宪政国家兴起语境下对胡鞍钢“集体领导制”理论的思考，Tsinghua University Journal (forthcoming 2015) [↑](#footnote-ref-190)
191. I use the Chinese term deliberately. See Liu Yunshan, Working Out a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Qiushi Journal 3(2): (April 1, 2011) available http://english.qstheory.cn/politics/201109/t20110924\_112568.htm. [↑](#footnote-ref-191)
192.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ee discussion in Larry Catá Backer, The Rule of La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deological Campaigns: Sange Daibiao (the 'Three Represents'),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Moder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16, No. 1, 2006.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929636. [↑](#footnote-ref-192)
193. It has been powerful enough to affect even the forms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gulatory context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See, e.g., Larry Catá Backer,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at a Crossroads: The State, the Enterprise, and the Spectre of a Treaty to Bind them All (July 5, 201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462844. [↑](#footnote-ref-193)
194. Chinese Premier Meets Cuba’s First Vice President, Xinhua, June 19, 2013. Available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206972/206976/8290188.html. [↑](#footnote-ref-194)
195. “The question is being aske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continuing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which Premier Hua’s speech affirmed, and the campaign to carry ou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Hua brought out the two controversial points dealing with this subject. First he said that “class struggle is no longer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our society.” Secondly he called for an end to “large scale, turbulent class struggle” in the future.” Michael Klonsky, Commentary by CPML Chairma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today, The Call 8(32) (1979), available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rol/ncm-5/klonsky-china-2.htm. (“Whether here in the U.S. or in China, there can be no substitute for concrete analysis of concrete conditions. This is the heart and soul of Marxism-Leninism.”). [↑](#footnote-ref-195)
196. Constitu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Program, available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7-10/25/content\_6944738.htm. [↑](#footnote-ref-196)
197. Fernando Ravsberg, Cuba’s Battle of Ideas, Havana Times, July 2010. Available http://www.havanatimes.org/?p=25770. [↑](#footnote-ref-197)